

黃震遐編著

西洋戰爭思想評述

正中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6468

上海圖書館藏引言

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是人類思想轉捩的一個關鍵。

在純粹科學上相對論和量子論已修正前代的刻板的定律，將此宇宙看成爲一種新異的，萬有皆動的科學的形上學的結構，直接影響了古典物理學，間接則影響一切智慧的標準，迫使人類重新思考，重新擬定生命的意義。

在哲學上，實體的認識論亦在糾正過去一切空想的和機械的論斷，邁步以向科哲合一的途徑；並將與東方再生的倫理觀念相融和，促進一種新智慧的時時代的來臨。

在實踐的政治效用上，全世界的「主義的思潮」洶湧澎湃，正在大規模的流逝。今後百川朝宗，匯於大海，亦必然影響到戰後的思想和社會。

在廣義的軍事上，到處都是宣傳戰、攻心戰、神經戰、思想戰。此次大戰的終極，亦必須是思想上的勝利，纔是確定可靠的勝利。

因此，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人類大戰，在客觀上已必須是一方貫徹其理想於對方的手段和一種創化未來社會的努力，而不應仍屬過去那種循環浪費的非理性的混戰。

惟其如此，故時代的要求，是思想領導戰爭，不是戰爭推動思想。祇有用健全的思想來指導戰爭，方能奠定戰後的社會；祇有用健全的思想來運用戰略，方能擊破對方的戰略；祇有用健全的思想來掌握戰術，方不致被戰術浪費！

這本小書的建設的意義，即係循此道路而進，並限其範圍於陸戰。

在全世界廣泛地研究「地緣政治」的時代，今後世界政局之日趨於一元化的霸權的獲得，將成為現實的動向。無論國際和平的呼聲如何普遍，而真能達到國際和平的途徑的，亦恐非戰爭莫屬。這是悲慘不幸的事，也是難以避免的事。唯一可能減輕這種浪費的程度的，更祇有用「心理戰略」來壓倒「地緣戰略」而已。

目 次

第一章 戰爭的心理觀	一
第一節 思想力	一
現代思想問題的擴大——現代思想的趨勢——思想的本質——思想的發展——思想與戰爭要素的關係 ——研究戰爭的途徑	一
第二節 思想與戰爭要素的關係	一六
精神力的作用——士氣的表現——人力的素質問題——精兵主義——大眾軍主義——多兵的影響—— 歐戰的結果——閃擊戰的貢獻——歷史上的「偶然」——「三體合一」的關係——「三體合一」 的作用——「三體合一」發展的形態	一六
第二章 戰爭的價值	一六
第一節 道德論	一六
心物論——善惡論——宗教的看法——道德與宗教——四大學者的勢力——基督教的厄運——帕米	一七

爾軸心——道德的勝利

第二節 目的論

戰爭目的之發展——戰爭目的之要義——時代條件的影響——經濟的目的——政治的目的——人道主義——威爾遜的貢獻——戰爭的問號——創化的價值——新的目的和定義

第三節 創化論

——戰爭代價的認識——戰爭熱狂的消失——製造戰爭的技術——戰爭理想的分野——戰爭理想的派別
——實際的現狀——戰爭理論的形成——思想戰的前途——結論

第一節 現代戰略的概念

—— 藝術的表現 —— 「天才」與「人才」

唯物論傾向——唯物論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和目前的科學——新時代的特質——新的科學概念——思想領導的重要性——若干史例——戰略思想的演進——克勞塞維此——恩格斯——福勒杜黑——賽克特——各個段落的躍進

第四章 戰略問題的關鍵 · · · · · · · · · · · ·

第一節 殲滅戰論

五〇

現代基本戰略為殲滅戰略——歐洲封建時期的戰略——現代殲滅戰的肇創——法國革命時期的攻擊精神——拿破崙的貢獻——歐戰時期唯心論的失敗——東線殲滅戰的價值——西線的陣地戰——生命的浪費——機關鎗的權威——幾個失去的戰機——普登道大努力的失敗——三個人的影響——閃擊戰的來源——拿破崙戰略的機械化——閃擊戰的前途

第二節 重力與速率

六一

一個機械的論據——重力的關係——速率的關係——重力與速率的配合演進——比較研究的結論

第三節 消耗戰論

七九

消耗戰為應用戰略——消耗戰發生的場合——西班牙的消耗戰——蘇聯的消耗戰——消耗戰必須轉變為殲滅戰——維爾幾尼亞戰役——凡爾登消耗戰——德蘇戰役的批判——現代戰略問題的結論

結論

目次

次

三

第一章 戰爭的心理觀

第一節 思想力

現代思想問題的擴大——現代思想的趨勢——思想的本質——思想的發展——思想與戰爭要素的關係
——研究戰爭的途徑

思想是力量的泉源，科學技術愈進步，思想的影響愈大。到目前，則地球上幾間著名的房子，如白宮、政治地理學院、克來姆林等，就是操縱全人類行動的總樞紐。億兆軍隊的生死，就是幾個頭腦思考的結果。我們每天都在接觸思想問題，直接間接感受到思想力的影響。凡對現象問題會有探索的心得或實際經驗的，都不容否認思想價值的偉大。而忽視其嚴重的後果，政治關係如是，國際關係如是，軍事關係尤其顯然。

二十世紀以後，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世界人類除實際利害外，已無絕對的畛域可分。思想上的各種問題，由音波、電力與內燃機關的疾速的傳播，已衝破一切時空的界限，使人類思維的歷程漸趨於一致化與概念化。國族之間所保存的特質，如軍國主義、個人主義、孤立主義等，已成不自然

的現象，遲早必歸淘汰。這是國際化的思想所自來的近因。進一步看，世界人類既有深度的相知與大體相同的見解，正向接近的目標邁進中。此種現象更非五十年前的社會所能有，故信最近將來必有更樂觀的演進。退一步看，則二十世紀兩度的世界大戰，實際上就是十九世紀各種理想的一再清算，思潮氾濫而匯成血海。人類在觀念上的鬪爭已瀕於最後的階段，亦必須而且必然地會迫使思想的更趨向共同化。

目前的思想關係已演進而爲天下一家，壁壘分明，發一言而驚天下，牽一髮而動全局。凡屬意見相近的，都站在一條線上。在此兩大思想陣線之中，便是目前的世界戰場。當一百年前，世界上尚會有十場各不相關的戰爭同時分別進行，在五百年前，也許會有五十場戰爭在同時進行；在二千年前，更許會有一千場戰爭在五大洲的山河大地上同時進行。越在古代，人類的關係便愈爲複雜，思想亦愈爲分歧。當法國革命時，歐洲變成一大思潮沖激的戰場。但亞、美二洲都未受到影響，非洲、澳洲更屬風馬牛不相干。一百年後，在威爾遜、列寧時期，便牽涉較廣，歐、亞、美三洲都蒙受劇烈的影響。到目前更祇有兩道思想主流，一個大戰場在謀世界問題的解決。人類戰場的空間已擴展到最大限度，將來亦不能超越此範圍。這是何以目前的戰士們應當負起新的思想任務來之故。

◎那麼，思想的本質是什麼呢？

自古以來，一切對於戰爭問題企圖加以解釋的說法，在理論上不外心物二元，在運用上不外精神、人物三種要素。換言之，戰爭的本體，往往也就是戰爭的要素，正和哲學範圍本身一樣。

舊唯心論者憑其先見的權理，常有難與現實的煩複現象相符的困難；尤其與十九世紀以後所發現的科學「真理」不能調和，故已成過去。

舊唯物論者憑其批判及辯證，更有流於偏激狹隘故步自封之弊，即其所根據的十九世紀的科學思想亦已落伍，不能吻合目前科學上的發現，故亦漸衰頹。新的二元論及多元論者及一本最新科學，反對因襲，提倡創造；但因本身立場含混，故影響力亦不大。

嚴格的本體論常會引起無謂的思辯，殊無實際的意義；與其流於空論，毋寧尊重常識與經驗。我們應該說：戰爭思想就是哲學思想的權力化，故不能有獨立的思想巍然存在。戰爭本身的思想都是根據哲學思想的反射而產生的。某一期的哲學思想占有支配社會的勢力，便影響戰爭思想，使戰爭思想以吻合當時思想水準的性質而出現。

因此，在唯心論成為歐洲思想界的權威時，便出現了黑格爾學派的克勞塞維此所貢獻的戰爭思想，其思想的實現則是一八〇〇至一八七〇年間歐洲各國的民族戰爭。在唯物論占支配勢力的時候，便走上唯物論的戰爭思想，其思想的實現則是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間世界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的分割奪取與第一次大戰。

當二十世紀的科學界另有新的發現時，則出現了福勒、杜黑、賽克特、米契爾等。其戰爭思想實現便是此次豪斯霍佛博士的「地緣戰略」及其附帶出現的閃擊戰。

但是這祇是現代科學文明所形成的一面，而且是較不重要的一面；其強大的另一面，就是思想作用之新異的復活，並且走上科學組織的途徑，而首先被列寧在歐亞的社會裏大規模地實驗過。這種前所未有的思想戰爭或心理戰爭的出現，可以認為是現代心理學發達上的最大成績。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間，莫斯科的克來姆林宮便是操縱全球思想陣線的總發電機，遙遙地指揮着德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遠東、美洲各地的流血或不流血的戰鬪，造成社會上極大的變動。這是思想戰的猛烈的開始，跟着來的影響，就是莫索里尼的法西斯帝主義、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荒木貞一的日本主義、和北巖爵士、托洛茨基、莫索里尼（蓋達）、豪斯霍佛、羅森堡、戈貝爾諸人的技術。這一種思想戰的大本營，是在歐洲。

所以，從「十月革命」開始，經過「羅馬進軍」、「潛城暴動」、「一二·六」事變，到目前，人間真正決定勝負的戰鬪，已經不在瀰漫着硝煙氣味的舊式的戰場裏，而是在印刷機的急轉和以太的傳播裏。這是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和五十年前的世界大不相同的所在。

一方面，這個心理世界上的另一道主流，便是基於古代宗教和道德的信力而產生的精神運動：基督教道統的「人道主義」，中國儒家道統的「王道主義」，印度教道統的「非暴力主義」等，融合了現代科學的技術與古代「以心傳心」的神祕力量。目前影響的範圍是在太平洋兩岸，在海洋上恰巧包圍着日本，在大陸上則包圍着歐洲。

所以無論是列寧、北巖、希特勒、莫索里尼、北一輝、頭山滿等的「技術」的系統，或是孫中山、威

爾遜、甘地等的道德的系統，其思想的電流都在這一個「洲際」的新戰場上占有極大支配的勢力，目前正在醞釀著一種迥異於往日的戰爭的思想影響，是極其顯然的。

因此，在這個又是「一切惟心造」的現實世界中，我們實無法避免不走入一個結論，那就是：現代戰爭的真實關係，將是一種思想問題。

目前這場大戰，就是各種思想的電流在交替反射地操縱着各種戰爭的要素，向着一個鶴的錯綜變化地滾進。在時間和空間上縱有相對的伸縮性，終有達到某種結局的一日。

戰爭的要素，是精神力、人力、物力（都是狹義的）。戰爭勝負的關鍵，也就是由於這三種基本要素的循環交替的影響而一段一段地被決定的。

這是一個縱的系統，精神力在上層與下層被人力物力交相影響，而思想則是「靈魂」，是創制者。沒有思想，人不能盡其力，物不能盡其功。思想錯誤，人必冤死，物更浪費。所以思想價值在軍事上的重要，更超過政治經濟其他活動。戰爭的功罪，得失勝敗，都要思想負責（尤其是戰略思想）。精神、人力、物力雖然有時亦可以影響思想，左右思想，決沒有思想本身那樣的責無旁貸。一九四〇年法國的戰敗，縱然在精神和人力上有些「戰敗主義」的傾向，在物力上懸殊過甚；但如沒有甘末林的戰略思想的基本錯誤，決不至於崩潰得那樣乾脆！一九四二年春季英軍在西南太平洋上的敗北，也是基於戰略思想本身的落伍。

思想無論在其廣義的（政治哲學）或狹義的（戰略原理）方面，都是現代戰爭的動力因

素，是基本要素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研究現代戰爭的方法，也必須把各種現象剖析開來，放在歷史的天秤裏評價之後，再用哲學的眼光分別從科學和藝術的角度裏來觀察鑑定。求得概念的結論，纔能夠吻合這個前提。

第二節 思想與戰爭要素的關係

精神力的作用——士氣的表現——人力的素質問題——精兵主義——大眾軍主義——多兵的影響——歐戰的結果——閃擊戰的貢獻——歷史上的「偶然」——「三體合一」的關係——「三體合一」的作用——「三體合一」發展的形態

關於精神力、人力、物力的再評價及其三體合一的關係

我們不願承認「天才」的關係真會有那樣的重要，像拿破崙、克勞塞維此、福煦等所標榜的一樣；但是將領們的思想偶然形成真實健全的概念（如拿破崙起程赴意大利時所懷抱的或魯登道夫從西線趕赴東線坦能堡時在火車中的形成的），具足了「三體合一」（精神力、人力、物力）的原理的時候，則其所部因此而獲得的增強的精神威力是會駭人聽聞的。

在政治上，有所謂「高潮」的現象，實則軍事上的「高潮」尤為顯著。由於祖國愛、英雄崇拜、革命熱忱、責任心、榮譽觀念等所造成的常勝軍的無敵的士氣，其偉大的成就，確有不可思議之處。

小而言之，則每一次戰場上的衝鋒，都是一種心理的「高潮」的表現。在密集戰術時代，很多的精練之師都能夠做到明知無望的死亡的前進，而隊伍始終不散，確實悲壯動人！

拿破崙在滑鐵盧會戰將結束時，命令他的禁衛軍向頑強的英軍陣地作最後的突擊。這時法軍兩面受敵，已無戰勝的希望，但拿破崙信賴其禁衛軍的忠勇，故仍作此最後一逞。禁衛軍六千人由奈將軍騎白馬前導，軍旗飄揚，如林而進。英軍用排鎗對其猛射，彈如連珠，禁衛軍沿途死亡枕藉，行列隨缺隨補，肅默無聲，毫無動搖之象。奈將軍的坐騎倒斃五次，跨上第六匹馬又繼續前進。到英軍陣前，全軍已死傷一半，於是英軍將其一部包圍，在近距離裏放列大砲三十門，實葡萄彈燃火以待。英將出列對禁衛軍高呼：「汝速降！」禁衛軍旅長坎白龍的答覆是：「禁衛軍寧死不降！」於是葡萄彈轟發，在血肉模糊之中，但聞亂呼：「皇帝萬歲！」

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之役，英俄兩軍在巴拉克拉發對陣。因為英將的命令傳達錯誤，以致英軍的輕騎兵旅六百餘人如箭出弦，向俄國全軍數萬人突擊；及至發覺錯誤，已無法挽回。俄軍用大砲密集轟擊，企圖將其消滅。輕騎兵旅首先衝散俄軍的騎兵，然後蹂躪俄軍的砲兵陣地，盡毀其砲，整隊而歸。歸程又受俄軍猛烈的追擊射擊，而全旅以旅旗為中心，始終團結不散，殘餘的一百人由卡坤根爵士率領歸還，報告：「任務達到！」英國詩人丁尼遜詠之曰：

他們不是問「為什麼」的。
他們的義務是服從與死！

在我國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如林啟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尤其是忠王李秀成的死守南京，據曾國藩報告：「城陷之日，餓軍十餘萬人，無一人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是我們比較熟悉的榜樣。

在美國南北戰爭中，亦多悲壯的事蹟，尤以南軍方面為著。一八六三年格的斯堡大戰時，南軍辟克特師的密集衝鋒，其英勇壯烈的情景，何等動人。讀史至此，靡不為之喉硬腦漲，熱血沸騰。

法國軍隊的死守凡爾登，在「他們決不能越過」的口號下，數十萬人同仇敵愾，死不旋踵。一九一八年夏季，德國的單獨的機關槍射手被協約國的戰車連人帶槍壓成肉醬，比比皆是。

由是可見精神如電，軍隊就是感電體，電流一經觸發，實可做出天下最豪俠最不自私的大仁大勇的壯烈事蹟來。千載之下，猶覺虎虎然有生氣。這就是所謂國魂、軍魂、戰爭之魂。沒有這種精神，歷史是無由造成的。

其次在人力方面，現代戰爭的武裝的人力，有兩種範圍，一種是「精兵主義」，一種是「大眾軍主義」。

精兵的來源有兩種心理背景，一是基於部隊本身的傳統與歷史養成的。通常團結的單位是團或師分別代表其戰術與戰略的傳統。在歐洲有許多軍隊的團旗上，都繡着該團自成立以來歷經作戰的戰勝的地名。團旗一出現，便挾帶此團隊數百年來的光榮的歷史而俱現，對於士氣的振奮作用，自然很大。「團隊精神」所以能夠充滿競爭心理，就是基於團隊的榮譽觀念在平時

的養成。

在歷史上具有豐富「團隊精神」的精兵，往往能夠達到普通大眾軍所不能達到的任務。這是因為他們已在長期的軍事思想的訓練和戰爭生活的陶冶下，已將其自身鍛為一種含有「騎士貴族精神」或「超人意味」的社會階級之故。過去的德國軍官團便是如是，日本也多少帶些這種傾向。

在大眾軍的性質上，有兩種背景：一為其所自來的民族性，一為其所依存的社會性。

在民族性方面，天下最優良的軍隊，自莫過於堅忍果敢而能夠主動的軍隊。這種軍隊的兵員的生理素質，一定要由膽汁質加多血質成分較多的民族性的體質來擔任，纔足以依託在現狀上，德國軍隊便具有此種特性。美國人是以多血質為主的民族，但亦不無膽汁質的成分。中國人的素質比較平均，但是最成功的中國軍人也屬於膽汁質加多血質。日本人則比較中國人偏於神經質，條頓民族是膽汁質加多血質較重的民族。德國人更比較顯著，英國人有黏液質的特點，美國人則偏向多血質。這是常識的看法。拉丁民族是多血質加神經質為主的民族，可以法國人為代表，意大利人比法國人更偏於神經質。斯拉夫人是以膽汁質加神經質為主的民族，但蘇聯人則已有新發現的多血質的傾向。

這是主要的分野，實際上則此種人類的性質交錯複雜，應以更細密的比例詳加判斷，始足以言準確。但大體說來，膽汁質富於堅忍果敢的特性，多血質樂觀邁進，黏液質偏重穩健保守，神經質

富於臆想創造，故德國人能攻能守，英國人能守不能攻，法國人能攻不能守，蘇聯人則正從過去的特點向德國的水準邁進中。

直到目前為止，各國大眾軍在作戰時所反映的民族特性，還是非常明顯。

關於大眾軍的社會性方面，重要的是兵卒材料的集成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問題。主動的兵卒材料，一定具有高度的情緒，是基於政治理想的覺悟而自發自動的戰士，能夠主動地創造戰局環境，犧牲其生命而感覺甚有價值。這種兵卒材料與「團隊精神」影響下的兵卒材料的唯一的不同點，就是大眾軍的精神是發自廣義的政治理解上，而精兵的精神則是發自狹義的軍事團結上。後一種在專門技術的訓練及實際的經驗上，都比前者更合現代軍事的要求。所以目前各國的軍事組織，也往往是以一部經過特殊訓練的精兵為基幹而以大眾軍為其外圍。主要的榜樣是德蘇二國。

至於被動的兵卒材料，則是強迫被徵而來的民衆，甚至於當局對於戰爭真正的意義，都沒有充分向其講解。此種兵卒材料，既然不過是「湊數」關係，自然危險甚大，與烏合之衆無異。倘如在戰爭的過程中不能轉變其素質，使其多少能夠發生一點「主動」的或「團隊」的精神，便是「敗戰主義」攻勢最理想的對象；雖最進步的國家社會亦所難免。二十年前的英國的北巖爵士、俄國的列寧和今日德國的戈貝爾等，便專會做這種「攻心」的工作。

因此，我們可見人力的素質問題，實是一種心理、生理與技術上的複合問題。特別是在質而不

是在量上，對於戰爭的關係最為鉅大。在軍隊素質上有文野、強弱及節制之師、烏合之衆的區別，有主動的兵卒材料與被動的兵卒材料的分野，其對於精神力與物力的影響都有判然的異同。叫與登堡到中國來當師長，十九保險失敗；中國軍隊如能擔任死守南洋，則由於自發的精神與華僑的支援，必有較好的表現。佛列德力克大王的戰列步兵如在一聲口令之下化作散兵線，則必歸逃亡，淨盡等於解散。華盛頓的「一分鐘人」（美國獨立戰爭時的自願兵）放在大佛列德力克的橫隊裏，更擔保全軍大亂，不能作戰。由此可見戰爭上苟用非其人，戰非其地，時間與價值不能配合，必無濟於事。這是「三體合一」中的「人力」的關係。

在物力方面，主要是理解和運用兩個問題，即科學的理解與藝術地運用沒有科學的理解，固不能產生藝術的運用；但如沒有藝術的慧眼，識破微妙重要的關鍵，則科學的理解也往往限於局部，流於瑣碎，難成大事。

近一百八十年來，西方的物力以無比的速度增加上去。自一七六九年瓦特發明蒸汽機，一八〇九年富爾頓發明汽船，一八二五年斯蒂文生發明火車，一八三七年發明電報，一八五七年改良煉鋼，一八七〇年以後普遍採用來復鎗，跟着來的便是鐵甲輪船、汽車（一八九〇年）機關鎗、（一八八九年）水泥、黃色炸藥、飛機（一九〇三年）、無線電、毒氣等。在質的方面，改變了戰術的面貌；在量的方面，則造成了歐戰時期西線的僵持。因為雙方勢均力敵，無法取勝，故祇能相互消耗，實是人類的悲劇。這一場空前的大屠殺，就是歐洲人力和物力無限制的擴大的結果。物質文明

的齒輪轉得太快，戰略思想跟不上，無法加以控制，故一發而不可收拾。戰略思想狂追數年，方於一九一八年的春季摸到一些頭緒，到一九三三年纔形成概念，後來以具體的姿態出現，便是閃擊戰。這是戰史中科學不能理解，藝術不能運用的一個過渡時代。

「兵貴精不貴多」，這是兵法上永恆的真理。古史所載大軍，動輒百萬自不可靠，有之亦當係烏合之衆。故中國史上兵多而勝的戰例，祇有戰國時期王翦伐楚一役；至如曹操、苻堅、王莽、楊廣的大軍，便都是大敗的榜樣。在西洋史上，波斯王伐希臘而禦亞力山大的烏合之衆，也是一樣。多兵往往祇是帝王的虛榮，對實際作戰不但沒有效力，反成累害。兵既增多，便要明白運用大兵之道。韓信固說「多多益善」，實則真能把握大軍所引出來的煩複問題而用之於實戰的，可說百無一二。拿破崙算最知兵，但亦不能帶兵百萬，一次用兵二十萬以上，多了就不利。近代歐洲因受徵兵制度之賜，兵又大增，到第一次大戰末年，福煦一人直接指揮的英、法、美、比、葡五國聯軍，便達七百萬人，以對付德奧的四百萬人（以上均在西線）。此種人潮的壓力，自極偉大，但因此消耗亦大，皆因間接指揮，各級機構馬虎草率之故。西線自一九一五年以後，全用砲彈狂轟，步兵硬擠，戰略戰術均一籌莫展。當時英軍前線中流行過一句口號：「將軍死在床上」。因為旅長以上的軍官始終就沒有到過陣地，祇在後面要求各種物力大量生產，多多發明，以便轟出一條血路來。第一次大戰結束的時候，雙方尚無一善策可破此「陣地戰之謎」。福煦雖手握第一線飛機五千架，戰車二千輛，大砲一萬五千門，可是用之不得其當。步步壓迫頑強抵抗的魯登道夫撤退二百哩，戰爭便結束了。這是證明

當時任何一位元勳宿將，在軍事思想上，都是笨伯，都沒有真正體會到「三體合一」的境界。以當時各國軍需工業白熱化的努力，科學專家多方面的發明，英國海軍之強大（等於戰前英美海軍的總和），一切生產技術條件，何嘗亞於二十五年後的今日。可是歐戰唯一的結果，祇留下了兩種觀念：一種是陣地戰經驗的鋪張放大，就是日後的馬奇諾主義；另一種是閃擊戰預言的創始成立，即福勒、杜黑主義。歸根納地，精神與物質、科學與藝術（軍事的）思想與原理、心理與物理、經濟、外交、文化的各部各門都是分庭抗禮，不相聯屬，故兵力雖大，不過徒增蟲沙之慘。在第一次大戰後，各國的精神力、人力、物力也是齊驅而不並駕，未見有何改進。直到十五年後，魯登道夫繆悟徹過來，而著「全體戰爭論」，承認他曾失掉好幾次重要的機會，都是因為思想未能適應真實情況，力量未能適切運用所致。同時，納粹亦已取得政權，大有新銳理想，與昏庸保守的其他軍事首腦截然不同。因有希魯二氏的準備，由是而得在法國北部的老戰場上，「以六萬死傷的代價，在四十天內，達到了流過六兆德人之血苦戰四年所不能達成的任務！」在二十年前，軍事上的「三位一體」原理尚與神學上的「三位一體」說一樣的費解；二十年後，德國軍隊所表現的卻是那麼簡單明瞭，輕而易舉。可見戰爭勝負的關鍵，力量固屬重要，思想的卓越卻更為重要。沒有力量，還可補充力量；沒有思想，便白白浪費力量。

納粹德軍所解決的幾個問題是：

(1) 機關鎗與鋼骨水泥據點工事無法徹底破壞的困難（即西線之謎）——用俯衝轟炸機

代替砲兵加以解決。

(2)陣地一點突破後無法迅速擴張戰果的困難（一九一八年最後攻勢之所以失敗）

——用機械化兵團代替步騎兵加以解決。

(3)敵軍後方聯絡補給線無法遮斷破壞的困難——用空降部隊加以解決。

(4)敵軍愛國精神戰鬪意志無法克服的困難（如凡爾登的頑抗之類）——用第五縱隊及神經戰使其崩潰。

(5)史立芬計畫因搶救東線而被削弱致失戰機的經驗——賴德蘇協定而得預防。

(6)兵員龐雜素質不齊易起內部問題的顧慮——由納粹忠實的黨軍（黑衫隊、棕衫隊等）加以監視鎮壓。

這已成爲歷史了，但尚未消失其影響。

由此可以證明人力、物力的影響與被影響，決定與被決定，實祇是基於一種基本原理的認識與正確方向的努力，並以經驗的辨別為補助的。若謂生產力與技術發達的結果，閃擊戰遲早總會出現，又何必故張其說，則何以蘇聯不用之以攻芬蘭，日本不用之以攻中國，英法不用之以攻納粹，美國不用之以攻日本？可見思想活動的速率，絕對可以打破定命論，歷史尚有很多的「偶然」，決定歷史的，往往就是這種「偶然」的收穫。如果認爲一切創造都是自然推演得來的，就無須乎要求純粹思想的努力了。英國出了一個瓦特，德國出了一個希特勒，戰爭本

體之現代化的原理偶然被德國的思想力所徹悟（雖不完備），必有較深於「心」「物」論者所能把握的宇宙真理。吾人雖不知之，偏執一端之理論更必不知之！

基本上意見，我們可以說：從思想到行動，認識到方法，觀念到現象，應是一套連環的發展。思想操縱精神（信仰力），精神操縱人力，人力操縱物力；人力物力影響思想，思想又改造人力物力。其埋應如自然界中的大氣的升沈，循環不已，但必有其主動的基元，故又一譬喻，便是精神如電，目不能見；人力如水，可以決隄；物力如冰，多年凍結，立可溶解。而思想力則如目前科學所見之「放射」，自成定律，可以潛化一切。故思想終是基本的動力，是精神力、人力、物力的「三位一體」的出發基點，是循環系統中的心臟。物力可以影響到精神、意識、情緒，但很難反映到純粹的思想。這是筆者對於戰爭要素的看法，在以下各章裏還要繼續論到。

因此，我們所主張的戰爭要素的本體，就成為一種以思想為範疇的「三位一體」的體系，跟着歷史的演進而不斷地連環發展下去。但其價值卻不一定是進步的，甚至於有時非但不進步，還會退步，造成極大的禍害（生命的浪費）。較政治上的錯誤更屬悲慘無謂，無法挽救。這就是因爲思想的本身不一定就是進步的之故。

站在歷史的觀點上舉幾個例子：目前的納粹德國如果戰勝了那麼這次戰爭就不會成為一種進步的戰爭。這是因為希特勒的指導理論是站在種族優越的偽證上的，結果一定奴役其他被征服的民族，很快的又要引起第三次大戰，對於人類幸福的價值當然是退步。日本如果戰勝了，則

「天皇」將成爲六七億人口的主宰，亞洲又將變成封建的帝國，更是退步。小而言之，則法國甘末林的戰略思想是站在過去錯誤的經驗上，因此折兵二兆，也是軍事問題本身上的退步。

地球上的物質是在那裏加速地運動，人口是在擴大的出生，物力是在更大量地被應用，因此戰爭的「三位一體」的循環圈亦在擴展擴展，由部落際而國際，國際而洲際。歷史的經驗亦在不斷地被人利用，誤用，亂用而加強地重演，錯演。人類社會的進步與退步更由於戰爭的推動而加速其禍福的進程。這一切都是要看思想是否能有畫時代的創造，如哥白尼、達爾文、耶蘇基督、釋迦牟尼、孫中山等人所做的一樣。

第二章 戰爭的價值

其次必須提出來究討的是戰爭的價值問題。「爲什麼要打仗？」戰爭行爲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是人爲的，還是自然的；是善還是惡；戰爭的目的何在，價值何在意義又何在；各交戰國的思想背景何在；億萬青年何以願在笳鼓聲中慷慨赴死，了無怨尤，究有何種的理想爲其原動力；這次大戰的路標畢竟指向何處？

這些問題，讓我們分別從道德論、目的論、創化論三種角度看去，然後再論戰爭本身的軍事問題。

題。

第一節 道德論

心物論——善惡論——宗教的看法——道德與宗教——四大學者的勢力——基督教的厄運——帕米爾軸心
——道德的勝利

思想上的大流，是心物二元。唯心論偏於理想，唯物論偏於實際。唯心論宜於統治，故恆居上層；唯物論則適於反抗，故恆居對立的地位。唯心論繩團結，唯物論重自由。唯心論多傾向性善說，唯物論多偏於性惡說。唯心論宜於創造，唯物論則宜於改造。唯心論是革命創業的動因，唯物論則為其實的根據。唯心論傾向於建設，但常在唯物論的破壞之後。單純的唯心論非流於玄虛神祕，難於捉摸；即陷於因襲頑固，妨害進步。單純的唯物論不是偏狹淺短，武斷一切；即過重功利，製造鬭爭，萬言歸一。歷史是唯心論創造出來的。但如人間沒有唯物論，則人智的文明也決不會解放發達到今日的程度。唯物論一再改造社會，但倘不借重唯心論的精神寄託，則誰願努力？誰肯去死？終極的理想又是什麼？

心物不能偏，應着重其相互的作用。中國儒道二家之講中庸自然，纔是客觀的至理。最老的哲學看法就是最新科學的意義。

人心的兩極爲善惡。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極則惡，惡極則善。歷史本身交替的推廣又時常以惡爲善。故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達爾文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尼采便做結論：「強者爲貴！」但是如此推演，人類社會又豈非善惡不分，真僞不明？故又有基督教呼籲「贖罪懺悔」，佛教宣揚「涅槃解脫」，儒家主「仁」，道家談「道」，墨家「兼愛」，康德、黑格爾、程朱講「理」，托爾斯泰提倡「人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欲求免惡，事在人爲。

人間亂由半由本能（荀子之「性惡」，保羅之「罪」，佛陀之「無明」，現代心理學所見之「獸性」），半由教養本能的來源，有現代進步的心理學爲之解釋，乃「里比朵」與「自卑意識」交替反射之關係。因此多數世上的大惡人，都是些精神病患者，而教養（即「惡育」）之來由，則係某種哲學之旁門左道，投世之所好，乘人之危而侵入的。譬如西方世界古代文化的峯極，是柏拉圖的哲學和「愛普魯」的藝術。但是當時支配權力階級的心理的，卻不是柏拉圖與愛普魯的精神，而是希臘神話中之酒神——狄奧尼蘇斯。因此形成哥林多之荒淫、羅馬之殘暴、文藝復興時期的奸詐、十八世紀大君主之獨裁、威廉第二之夢與希特勒之狂易，並有阿里斯地布斯、馬奇亞維里、尼采、達爾文等爲之辯護。東方古代社會文化之峯極，爲儒、釋、道三派，但真正影響權力階級的心理的，卻不是在朝之儒與在野之釋道，而是旁門左道的陰陽家、方士、楊朱、法術家、縱橫家之流。因此形成日本之神道教與歷代中國官僚主義的藉口，其反面則爲歐洲古代的奴隸戰爭、中古之農民戰爭、中國之黃巢流寇，而終於馬克思的階級鬭爭與托洛茨基之世界革命。要不外不擇手段，

以暴易暴，循環報復而已。

人間「治由」，亦半由本能（孟子之「性善」、柏拉圖之「觀念」、奧古斯丁之「恩典」、佛陀之「智慧」、康德之「理性」），半由教養。本能的來源，可在人類心平氣和之際所感到的幸福覺中體味得之，可在助人為樂的經驗中見之，亦有現代的心理學和生理學可為解釋。人類在「善良」時，一切心理、生理機能的發展，多較為正常健全，更適宜於智慧活動。而教養（即德育）的來由，則可由儒家生活道德的修養、王道政治之理想、基督教的天國、佛教的境界、西洋理想主義者的理想中得之。孔子和魯之治、貝里克雅典之治、漢唐之治、孔雀王朝之治，是其消除階級種族偏見，要不外多為他人打算，維持最大多數的幸福，以求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

目前的大戰爭，便是這兩種勢力的頑抗。在宗教家的眼中看來，便是一種懲罰人類的「劫數」，由魔鬼黑暗的勢力在從中操縱的。基督教的新約啓示錄中載着：「斯時萬國君王的雄師，齊集亞瑪吉頓，準備作最後的廝殺！」又預言經此天搖地顛的大戰之後，魔鬼終歸敗亡，光華燦爛的新耶路撒冷將自天而下，耶穌基督親自統治人世。人類有一千年的幸福和平。彌勒菩薩召開龍華大會，普天同慶的盛況，也正是佛經所常提到的。至於中國儒家所謂大同之世的到來，則更是一種有血有肉的看法。

波斯拜火教將宇宙分為善惡二神，即光明與黑暗兩種勢力，永遠鬪爭，其他各教亦多隱喻此義。這次戰爭如果不能合理的解決，則光明與黑暗兩種勢力的鬪爭勢必永無已時。從人類道德精

神的精髓，即博得大多數人同情之宗教的道德戰線的現狀看來，代表西方一線光明的心理基礎，還是基督教，在東方則是儒、印二教。所以一切戰爭上的道德意義，也都可以向此具有十二萬萬信徒的三個精神王國集中，其他任何哲學的或政治的信仰，都沒有宗教勢力的宏大，沒有這種統一的人生觀和宇宙觀，沒有這種潛在的力量。

因此，我們以宗教來代表心，代表善，代表光明，而與黑暗的勢力搏鬥，在殺伐的戰場上，另外建立起一道廣大教化的戰線，在飛機大砲戰車之前，強調蓮花和十字架的光明；用「天下爲公」的心理大砲來對付「日爾曼主義」和「日本主義」，把海潮一樣的祈禱聲、誦經聲、鐘鼓聲來掩蓋疲弱的「德意志高出一切」和「君之代」！

當然，這種辦法祇是一種譬喻，一種精神的假設，並不是叫人人都做牧師和尚，採取「不抵抗主義」。可是定必要有一種覺悟，一種智慧，使這把正義的寶劍不但要用純鋼來煉成，並且要用心電來化成，不但要推行軍事的征伐，還要宏揚道德的威化。這樣纔是一種進步的改革，纔對得住綿延的後代，纔不愧爲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文化人類。

另一方面，在十七世紀的歐洲思想界裏，有四個學者提供了四條定律：「人口論」、「適者生存」、「階級鬭爭」、「權力意志」。馬爾塞斯的「幾何級數」造成了帝國主義者對付弱小民族的藉口。其結果是非洲和大洋洲上的「野蠻人」已將瀕滅絕的境地。達爾文的見證奠定了白種優越和「超白種」的日爾曼人最宜於統治寰宇的理論。馬克思吹起了俄、德、匈牙利、中國的仇

殺尼采製造了威廉第二、莫索里尼、希特勒這一羣戲子。從一九一四年起，估計約有二千五百萬人死於戰場，三千萬人死於饑謹和屠殺，三千萬人殘廢，二萬萬人流亡。這是蔑視基督教義的四個歐洲學者的現代貢獻。

又有一個德國參謀克勞塞維此，遺下了一部血書，於是造成了拿軍隊的生命來作爲賭注的定律。從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止，約有六百個師完全消滅。香檳、凡爾登、森姆帕香代爾的戰血橫流，杜黑、福勒魯登道夫、米契爾等是這次大戰的預言者，事實上竟超過了他們最恢宏的理想，連石九築泰都滿足了。

這以上的又是一個道統，從馬爾塞斯到豪斯霍佛博士，從哲學的前提到戰術的結論，隨着近八十年歐洲勢力的膨脹，風靡了世界，每一小城市裏都受到衝盪，每一個受過學校教育的人直接間接都受到影響。在東方受得最深刻的便是陝北的中國人和三宅坂的日本人。

直到目前，四大學者的理論還是最時髦的，康德、黑格爾、費希特的大作已被納粹青年視為迂腐的古董，棄而不顧。美國威廉傑姆斯和杜威的實驗理論，那麼冷冷的，能夠產生大的力量出來麼？柏格生和羅素對於當今的大亂能有什麼貢獻呢？

民主政治的哲學背景是什麼？世界戰後人類的精神應該寄託在那裏？假定對方跌倒了，那麼對方二萬萬人難道就此暗無天日了麼？又是一個「凡爾塞」麼？

在首次大戰以後，歐洲就開始徧徨了，結果徧徨了二十年，還是一籌莫展，還是一個奸詐虛偽

謀略縱橫的戰國局面，絲毫沒有正義感，沒有俠義的精神。於是希特勒手執「我的奮鬥」，以教主的姿態出現，而二十萬青年樂爲之死！

托洛茨基已經帶走了世界革命的火種，現在的蘇聯是在轟轟烈烈地「保衛祖國」，馬氏的「階級鬪爭」的學理已變質而爲地下活動的「技術」，正被「格斯塔波」「奧斯拉」和一切第五縱隊的組織者儘量地借用，而且着着改善，反有後來者居上之勢。

達爾文和尼采的天下實不容易克服，因爲他們手中握有全部歐洲十九世紀自然科學文明的精華，並將古代羅馬帝政時代的英雄的、唯物的奮鬥的雄風都發揚並恢復了。歐洲的道德精神又倒退二千年，回到耶穌基督被釘死在髑髏山上時候的狀況。

在此大風暴大洪流之中，歐洲的基督教又遭受空前的惡運，一部分逃到倫敦、日內瓦；一部分躲在羅馬；大部分潛伏在一「異教」的五字旗下，重又渡其使徒時代的被壓迫生活；另一部分則逃入亞洲和美洲。但亞洲又有日本的神道主義，由「天照大神」領導出來，貪心如火，殺業如山，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上橫衝直撞，其罪之重，更非基督之血所能代贖。所以基督教目前不僅碰到亞瑪吉頓的大劫，由撒旦一人作祟，而且是由「撒旦的三位一體」，即希特勒、莫索里尼、東條的軸心在同時作祟。尤其嚴重的，便是希特勒竟然以「假先知」的口吻來對人說：「上帝命我如是！」而卡爾巴特博士在日內瓦的大膽反抗，則已將瀕保羅殉道的末日全歐的上空，妖魔縱橫，十字無光！

目前基督教的道德的大本營，是在美國，其前哨則分據英倫瑞士及被幽囚的羅馬。他們在道

總的戰場上，正向全世界呼籲，企圖喚醒五萬萬基督徒的靈魂，來與黑暗勢力繼續鬪爭。但是另有許多理由，可信精神力量怕不能單獨的從那裏產生出來。

第一是基督教的組織是分散的，並有門戶之見的，而其教義自身的偏狹性亦為一種障礙，已經不能抵抗十九世紀西方世界的科學與唯物主義的摧殘。

第二是民主國家本身就有許多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帝國主義）的，即有所成，恐亦不能更徹底於曇花一現的威爾遜主義。

基督教道德的戰鬪是失敗了，並不是失敗於今日，而是早就失敗於十九世紀。在托爾斯泰和威爾遜兩度反攻頓挫之後，便一直是退卻運動中的後衛的抵抗，而不是攻擊運動中的前衛的突擊。現在基督軍已退到新防線，更無單獨作戰的能力，但是因為這一道新防線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土，具有重建一支龐大的道德軍隊的實力。因此可以斷定基督教的鬪爭不是沒有前途的。

那麼，另一道防線呢？基督教的友軍呢？東方的道德力的偉大的團結呢？

目前全世界的黑暗勢力正分為東西兩道火流向「人類搖籃地」的帕米爾高原進攻，人類經過不知若干萬年的東流西徙，如今又走向家園，重新回到我們共同的公祖的發祥地來了。

這塊地方，廣義地包括了中國西部、俄國東南部、印度北部和依蘭高原，而以重慶和德里為軸心。三千年來，孔子在泰山頂上，釋迦在恆河的森林中，鎖羅斯德在波斯的花園裏，先後在此傳道，誨人以仁義慈悲光明正大的義理，促成了漢唐、加賦式加、孔雀王朝的豐隆的德業，產生了唐太宗、阿

育王這些大英雄，今日在帕米爾高原一帶所見的萬年之峯，一千年之雪，都會被法顯、玄奘、鳩摩羅什等人的腳趾步步踏過，而與加利利海濱的耶穌基督遙遙相應，貢獻給人類以另一種永久生命的意義。所以這種地方無疑的就是支撑全世界精神道德的堡壘。到今日為止，還有八萬萬人分別團結在這種道德的力量裏，或以慈悲堅持非暴力的抵抗，或用忠孝築成血肉長城！這種深遠博大的道德精神，過去既非武力所能摧毀，今後更永遠不會；而且還要隨着力量的增長，把這種道德精神帶出「人類的搖籃地」，重現光明於世界。

今日之戰為義戰，即孟軻所歌頌的仁義之師，王者之道。來日我武維揚，韃伐用張，纔是人類道德的真正實現，更是對方二萬萬人之大幸。所以今日的問題是：歷史能不能符合地理，道德能不能跟上軍事，精神能不能克服物質，主義能不能達到理想。

四大學者的理論是冷酷的、理智的、科學的，要同四大學者競爭，要同豪斯霍佛博士的專家們鬪法，一定不能採用同種落後的武器，而必須借助感情，偉大的感情，用感情的浪潮來淹沒這些科學的偽證，纔能必勝。

當第一次大戰時，威爾遜的口號是「為人道而戰」。這句口號的道德價值，到今日尚存餘效。可是，它的新口號呢？他的主義呢？除掉大西洋憲章的約法外，它的道德價值和真理呢？

所以精神的力量應由中國西部和印度北部較為荒僻的地區中產生出來，以其偉大的哲學觀念昭示世界，然後協同美國的金火之力，把它推出去！正和當年十字軍的傳播基督教，阿刺伯軍

的傳播回教，唐軍的傳播基督教於世界一樣。

否則，那麼這次戰爭也就祇能臨時解決循環不已的政治問題了。

第二節 目的論

戰爭目的之發展——戰爭目的之要義——時代條件的影響——經濟的目的——政治的目的——人道主義——威爾遜的貢獻——戰爭中的問號——創化的演進——新的目的和定義

人類戰爭的關係，除掉它最重要的道德的意義以外，便是它實際所需的目的問題。換句話說，目的也就是宗旨，就是戰爭的最高指標。一切戰爭行為都要認清這個目標，跟着這條幹線來發展。根據科學的社會學（包括唯物史觀）的看法，這條路線是這樣發展的：

(1) 氏族社會時代 經濟上為原始共產主義的方式。氏族之間，弱肉強食，全族公有，現在非洲和大洋洲的島嶼上，還有這種戰爭形態。這種戰爭的結果不是發展為軍事部落，就是發展為封建社會。

軍事部落是由弱小的氏族擴展而成，應以奴隸經濟為主，雄者指揮之。軍事政治完全配合，全部落皆兵，以掠奪為主要目的。古代的羅馬就是由此而來。游牧部落（民族）的狀況與軍事部落同，但以畜牧經濟為主，此種部落戰爭擴大時，便是歷史上的匈奴、蒙古、突厥、

陳刺伯人。

(2) 封建社會時代 封建社會是氏族社會的正常的發展，以自然經濟（農業）為主。武力由

貴族及傭兵組成，多數民衆沒有政治思想。戰費由剝削人民得來，戰爭目的在互爭雄長，戰略服從政略（封建需要）。中國春秋和歐洲中古時期的諸侯混戰都屬此類。

(3) 商業資本主義時代 有兩種：一種是由軍事部落發展而來的奴隸社會，一種是封建社會發展而來的君主專制社會。奴隸社會以奴隸經濟為主，保留徵兵制度，戰略服從政略

（經濟利益），目的在掠奪財富擴展霸權，沒有政治思想。戰爭野心龐大，殺戮殘酷，以滅亡為慣常手段。歷史上的羅馬帝國即屬於此類。君主專制社會以商品經濟為主，多用傭兵制。戰爭目的在繁榮國家經濟，鞏固統治，增加威勢。政策上有較大的伸縮性，戰爭有政治的要求。中國漢、唐、宋、明、清各代和歐洲十七八世紀的戰爭，均屬此類。

(4) 資本主義社會 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及君主專制政治之發展，但由於工業革命而加劇。經濟採自由競爭，個人地位日高，戰爭變為新興階級共同之利害，故形成政治思想，有口號，戰爭的形式主要為民族戰爭，全民皆兵。其目的在求民族地位之強大。歐洲自法國革命起到俾斯麥統一德國止約七十年間的歷史，屬此類。

(5) 帝國主義社會 為資本主義之發展，資本集中，戰爭又成為少數人之利益關係無思想背景，無遠大政治計畫，以摧毀對方獨占經濟市場為目的，戰爭殘酷，缺乏統籌，浪費甚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榜樣

(6) 社會主義社會，真正的社會主義祇是理想（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間曾在俄國失敗地實驗過），實際上祇有由帝國主義發展來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兩種。國家資本主義（法西斯、納粹）之戰爭為民族戰爭之擴大，演成爲有思想、有主義、有計畫、有步驟之新帝國主義戰爭，目的在求某一民族統治世界的一切。國家社會主義係由社會主義修正而來，有思想、有主義、有計畫、有步驟，戰爭的目的爲保障一國社會主義之建設或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

以上是正規的戰爭社會史的發展。此外在現代發展進程中保留過去形態（時代落伍）而交錯存在並繼續發展中的戰爭則有：

(1) 民族革命戰爭 是在目前尙逗留在民族主義的階段中而不得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從事革命反抗的戰爭，並以民族自由解放爭取社會進步的目的，其特點應爲全民動員，政治重於軍事，有思想、有計畫。中國、土爾其屬於此類。

(2) 弱小民族反帝戰爭 如封建社會性質之阿比西利亞，軍事部落性質之蘇魯（南非洲）、游牧部落的里夫，氏族社會的若干南洋羣島土人部落（抗日）等，均屬此類。

根據上面這些機械的看法，戰爭的目的是由零而整，自小而大的；並且提供了下面三個結論：一、具有最進步條件者必占優勢。二、落伍者之能否生存，須視其能否迎頭趕上而定。三、政治思

想關係甚大，一切必須由國家統籌，纔能發生力量；進一步說，便是思想一定要符合一個水準（國際範圍），經濟一定要達到某種程度（國營統籌）。

然而我們借用唯物史觀的看法，僅此已夠，否則就要跌到機械的羅網裏去，從此坐井觀天，以爲太陽是繞地而轉的了。

戰爭目的基於時代社會的要求，實有多種的欲望隨之而生。這些欲望有些是經濟的、政治的，有些卻是宗教的、道德的。吾人試一翻歐洲從公元四百年起到一六四八年爲止的歷史，單是宗教戰爭的記載便達十餘次之多。這些宗教戰的真實的、內在的目的，固然不免參雜有政治、經濟的要求；可是若說第一次十字軍開始東征時的戰爭目的純是企圖掠奪近東的財富，或馬丁路德的反教運動不過是德國諸侯的政治野心與北歐商業勢力抬頭的反映，則斷不能理解西洋歷史，更不能明瞭此一千一百年間歐洲人精神生活的實況。又如古代游牧部落對於中國和羅馬邊境的零亂的入寇，其目的不過是子女玉帛的掠取，以滿足其貪婪獵奇的欲望。這種戰爭若說是「政治的另一種方式的繼續發展」，亦必失其真象，而顛倒戰爭的信史。舉例來說，在十九世紀以後，恩格斯和克勞塞維此二人分別強調經濟和政治的價值，實因二人所處的時代要求的重心不同。恩格斯死去的時代，正當資本主義末期與帝國主義初期的階段，這時歐洲社會所痛切要求的已非政治而爲經濟，故恩格斯的唯物史觀的看法，正合此一時代歐洲大多數人的欲望，其理論自能成立。克勞塞維此則不然，他處處皆以國家政治爲前提，這是因爲克氏生存著述的時代（一七八〇

一七八三一年）適當資本主義初期封建勢力反動之際，拿破崙的英雄主義已夭折在滑鐵盧，梅特涅的封建餘威又瀰漫全歐，一切受過自由洗禮的人莫不深感窒息之苦，而追求其寄託於黑格爾的哲學和浪漫派的文學。這時中歐社會尤其是參加過德國民族解放戰爭的退伍軍人們所最感苦悶的，自然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故克勞塞維此的「戰爭論」的精神基礎，實即是德國民族主義者對於國家統一民族發展的普遍要求中的軍事方面的表現。正和里格爾、謝林之於哲學，費希特之於教育，席勒之於文學，希來馬赫之於宗教一樣，是發自同一的泉源，同一的基調的。進一步說，就是不論唯心、唯物，克勞塞維此和恩格斯都是能夠把握時代先兆的人，可說都是一種「天才」。克勞塞維此安排下五十年的天下，預言了德國的國家統一運動與對丹麥、奧國、法國的民族戰爭，其影響直到資本主義的末期纔漸漸消失。恩格斯接着安排下另一個五十年，預言了帝國主義的爭奪殖民地市場和第一次大戰，以及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成立，直到凡爾賽的和平會議。克恩二氏給予戰爭目的論的定義可說都有五六十年的正確性，都有一種先覺性的價值。

跟着第三個階段就是我們的時代，但在我們這個時代和恩格斯的時代相銜接的階段，尚有一個過渡的時期。這個過渡時期的代表人物，就是威爾遜，其口號是「爲人道而戰」，其夭亡的產兒則是國際聯盟。威爾遜的理想，在歐洲過去三千年的歷史中，確實少見，可以認爲是真正表現了原始基督教的博愛精神，是四福音書中的耶穌基督本人的理想，而非日後被保羅、奧古斯丁等所

狹義化了的「小乘」的教義。因爲在基督教的「小乘」教義裏面所憧憬的新耶路撒冷，正和馬克思所夢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出生一樣，都要先來一場刀兵的大劫，以收天下之「惡人」；還要產生過渡時期的貴族（上帝印記選民與無產階級），以統治此焦土上的天國，實都不明心理學，更不懂中國儒家的王道的優點。「惡人」難被肅清，到頭又必起而革此新興貴族的命，殺伐相乘，循環不已，天下焉得太平？所以更覺得威爾遜個人理想的可貴。威爾遜固然失敗，國際聯盟亦非其理想的產物（是勞合喬治與克雷曼梭的副本），但威爾遜的精神不死，而今有羅斯福、貝納斯諸人起而響應，但不幸當時因爲時機未熟，遂致中途流產，結束掉這曇花一現的「人道主義階段」。不久便證明以力服人者終非心服，「老虎總理」在凡爾賽宮中得意的獰笑，早伏下雷諾亡國的痛哭。當國際聯盟尙未撤兵魯爾，共產國際的理想甫經頓挫於華沙，惡人便已接踵興起，並且以驚人的思想組織力興起。用達爾文、尼采的混凝的精神大砲，來痛擊馬克斯、亞當斯密、柏格生的不相聯屬的陣線。不久中國以儒家與創化論的精神逐漸爬起。日本又以神道教與達爾文的大砲橫行遠東，飲馬南洋。世界從此畫分兩道思想戰線。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十年之間，多數的思想主流，先後急激地向心集中，勢如百川朝宗，匯於大海。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時代要求，社會動向，已演成由思想而現實的局面，所以這個時代應是以思想爲戰爭目的的階段。威爾遜時期已是如是，今日尤其迫切。

目前的世界是一充滿問號的世界，爲什麼老是要打仗？戰爭的真正的目的究竟何在？民主國

家勝利之後又將怎樣？萬一侵略思想得勝又將如何？人類是否還要再打第三次以及無窮盡次的世界大戰？走什麼路線纔有出路？這些潛在的疑問已普遍氾濫於當今的社會中。戰爭目的的認識已成普遍的要求，帝國主義的時代已成過去，今後各國無論採取什麼政策，終必走上力量更集中，國際關係更密切的民族社會性的道路。戰爭的目的就是要求達到這種理想，連侵略陣線方面都不能不如此考慮（雖然所採方式或許不同）。

所以，綜上所論，戰爭的目的論問題就是一種創化的發展，拿兩方來講，從十六世紀開始曾經由馬奇亞維里（一四六九——一五二七）、薩克斯（一六九六——一七五〇）、克勞塞維此、恩格斯、威爾遜諸人分別代表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君主專制政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以及我們的時代，而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方面予以理論的確定。雖然在現階段尚未完全達到統一的步調。

因此，我們對於一百年前克勞塞維此所貢獻的戰爭定義：「戰爭是用暴力來貫徹其意志於對方的行為」亦必須加以修正而為「戰爭是人類貫徹其政治理想的暴力手段，並為思想鬪爭的進步的發展」，纔能符合這場大戰的意義。

這就是說：「今後戰爭雖仍以武力為主，但政治理想上的鬪爭，更採擴大的方式配合進行，以求達到消滅敵人的政治理想為止。真正的敵人並不是武裝的軍隊，而是這些敵軍的頭腦中的意識，故無論在戰時、戰後，都要運用最大的宣傳和教育力量來清除敵人的心魔，並免除其報復性的

後果，纔能符合「天下爲公」，和「祇有正義，你纔能有永久的和平」（甘地語）的警句的意義。

第三節 創化論

戰爭代價的認識——戰爭熱狂的消失——製造戰爭的技術——戰爭理想的分野——戰爭理想的派別——實際的現狀——戰爭理論的形成——思想戰的前途——結論

文明社會的知識永在進步，理性愈增長，蠻性愈減少，對於戰爭的認識便愈深刻進步，對於戰爭的代價的估量亦更精明、敏銳而正確。歐洲在十七八世紀打仗，根本無多話好說，大家埋頭傻幹就是；到了十九世紀，便要提出「自由」、「平等」一類的口號出來，已經是爲口號而戰，不是「爲戰而戰」了。時到如今，則雖有整本的書、大套的理論、專業的機構、科學的技術，受過特殊訓練的宣傳人員，然而人智進步，效果反不如前（除非從小練成，如希特勒之戰爭嬰兒）。當一九一四年八月宣戰之日，巴黎、柏林人山人海，狀如瘋狂，德軍出發，爺娘一路勉以大義，法軍出發，香花夾道雨降，在馬賽曲的歌聲裏，愛侶挽臂至郊外。當時英國的名記者腓律吉布司看到這種壯美的情景，非常感動，在他的名著「戰爭之魂」裏對之描繪甚詳。事隔二十五年，當巴黎、柏林重覩其世仇宣戰的露布時，據法國名記者塔布依女士和美國駐德記者希萊（柏林日記的作者）的報告：「法軍秘密出發，淚含於睫，巴黎車站之上，出征者與送別者均鴉雀無聲，宛如送殯。柏林的狀況，亦好不了多

少。當宣戰之日，餐室旅館之中，震轟大鳴，繼以軍樂，發言人慷慨激昂，宣布開戰的消息；但多數民衆聽完之後，竟不見有歡欣鼓舞的氣象，惟表情嚴肅而已。所以理性經驗的發達，上次戰爭的慘狀的回憶，而尤其是政治問題的理解的複雜化，已使二十五年前的歐洲青年與今日的歐洲青年迥不相同。今日的歐洲青年已非熱情浪漫的「傻子」，而為心情練達的成人。在這次戰爭中，事實證明他們雖仍認真服務，捐軀疆場，表面情形和前次戰爭並無不同，但仔細觀察，卻可以發現他們都有一種偏向理智的覺悟，而不是熱情的衝動的傾向。這在正面看，自然是他們目前已進步到為某種他們所信仰的政治理想而戰，而不僅是單純的愛國衝動，見義勇為。在反面看，則是證明西方的青年已漸脫離其傳統的好戰性，內在已有渴求和平的願望。祇有希特勒自幼養成的納粹青年黨員，纔是代表的戰爭熱狂者，但其總數不過占德國大眾軍的五分之一而已。

這次戰爭的特點之一，便是情緒的消失與理性的醒覺，這是非常值得深長思維的現象。這不僅歐洲如是，他處也是一樣。時間愈演進，那種十九世紀的狹義的國家意識所能觸發的戰爭高潮，便愈像空中的雷聲，表面的火焰，雖然能夠用來發動戰爭，卻不能支持長期的戰局，更不能結束戰爭。

惟其如是，所以目前反動的勢力纔見高漲。世界政治上的野心家見到這種潮流的趨勢，知道再用過去的方法來製造戰爭，歌頌戰爭的價值，是無效了；必須另用其他更有效的心理技術來彌補這種缺憾，纔能符合現代社會的某種心理而達到他們的夢想。這種新興的現代技術，就是製造

戰爭的技術。

製造戰爭的先決條件是要有一種以哲學思想爲背景的政治理想，而這種「理想的理論」又必須要和當代社會的流行心理有高度的適應性，表面一看就像是羣衆自然的要求似的，方屬理想，次之，纔是實際問題上的若干點的特別加強，放大，添加謠言偽證，恐怖與仇恨的因素，以求預先奠定日後要變爲行動的心理基礎，對外則是藉口。

這一切都是可以從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日本軍部的理論與實際中辨別出來，要多少就有多少（見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羅森堡的「血與光榮」、橋本欣五郎的「日本主義」等）。

因此，這種逆乎潮流的反動勢力，在技術上確是無憾的，在理論上也不能武斷它們的力量輕視它們的作用。一則是因爲它們都曾經過長期的科學的洗練與製造，二則是因爲它們本身亦都有思想背景，都能夠表白出人類本能的欲望，甚至於一部分的真理來。

結論是目前約有三四千萬的青年人雖已不再單爲忠君愛國的簡單觀念而戰，卻仍在爲另一種理想而戰，而且比較上還要堅決冷靜，自以爲是些。這些人雖已發展而爲較理性的人類，並多少含有希求和平的願望；但他們也許會認爲他們目前所走的路就是手段，正由他們的流血犧牲來達到這種共同的理念。這纔是何以在青天白日到來之前雷聲和火焰必更其猛烈地進行之故，人類的不幸也就在此。

因此目前的世界大戰已由國際演進而爲洲際，千萬種的問題均有集中的趨勢，思想亦正在

集中的過程中，並已明確地歸納為兩種範疇，任人抉擇，並且都要參加鬪爭，陷於思緒的激流，邏輯的怒濤，再無保守中立的餘地。目前是誰都在此風濤險惡的思想的大海之中，危機四伏，渺無邊際，或同登彼岸，或慘遭滅頂，均視其抉擇與努力的方向而定，誰都不能倖免。

進一步說便是目前的大戰已明顯地分為兩條思想上的陣線：一屬主觀上的認識，是功利的、鬭爭的看法；另一種則屬客觀的認識，是因果的、創化的看法。前者所造成的戰爭思想，是投機的、賭博的；後者所造成的戰爭思想，則是人道的、建設的。世界問題雖多，總不外這兩種思想的對立。人間真偽不明，皂白不分，非打出一個結果來不可！

主觀的認識論適於人性，順乎本能，不受文化的陶冶，故自古以來，便支配人心，主宰戰場，形成人類過去慘澹的歷史，將來亦難倖免。但是客觀的認識亦非全無戰勝之望。孟軻的王霸之論，威爾遜的人道主義，是理論；魯騷的天賦人權所促成的法國革命是榜樣，三民主義的理想便是希望。

目前大戰的思想背景是：

(一) 主觀的認識（功利的、鬭爭的看法）

(1) 功利的認識脫胎於霍布斯、陸克、亞當斯密斯、李嘉圖、邊沁、彌爾諸氏，可以亞當斯密斯及彌爾為代表。彌爾父子，均為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不僅代表資本主義，而且代表海外拓殖的利害。故其戰爭思想的泉源，亦是重商主義、實利主義、機會主義、「寓商於戰」，時刻不忘資本與利潤、幸福與代價、光榮與實惠，人與利己，是以純為理想則不戰，拚命則不戰。

沒有確切把握的投機亦不戰，非至迫不得已，不起傾國之兵，不赴毀家之難。英國的大小辟特首相、狄斯雷里、格來斯頓首相，以至張伯倫首相、大資本家、孤立派、死硬派，都屬於此一範疇（思想的源頭已有三百年）。

(2) 戰爭的認識脫胎於馬爾薩斯、達爾文、馬克斯、尼采諸氏，當以達爾文的適者生存與馬克斯的階級鬭爭為代表，滲以尼采的超人論。戰爭思想陷於極端的偏激、誇大、冷酷與唯物的無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一面尼采狂呼權力意志英雄道德，夢想造成一種超人統治的世界；一面馬克斯高唱階級鬭爭，力圖造成無產階級獨裁的社會，認為生命即是物欲（費爾巴赫），物欲即是鬭爭（馬克斯），鬭爭即是真理（尼采），非用暴力，人間決無從改造；非血洗世界，不能消除仇恨。魄力極大所下的賭注亦極大，因此產生了威廉第二、田中義一、托羅茨基、莫索里尼、希特拉、東條英機，誘發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這又是一個範疇（思想的源頭不過百年）。

(二)客觀的認識（因果的、創化的看法）

(1) 因果的（人道的）認識脫胎於東方儒、佛與西方基督教的傳統（包括聖西門、叔本華、林肯、托爾斯泰、威爾遜、甘地、泰戈爾等），當以孟子與新約二書為代表。戰爭不外王霸之戰、愛與罪之戰、公理與強權之戰、光明與黑暗之戰。世界是苦海，人間充滿罪惡，唯有推行「天下為公」的大道，成立永久性的和平機構，纔能確保人類不再遭劫，唯有以「戰爭

消滅戰爭」，根絕軍國主義，纔能永固撤旦於地獄。這是威爾遜出席巴黎和會時的遠大的抱負，是卡爾巴特博士、鄧波爾主義和庇護十二（今日基督教新舊二派的領袖）的呼籲，是托爾斯泰之所以躬耕，是甘地之所以絕食，是泰戈爾之所以創辦東方大學，是多數儒、佛傳統信仰者大致相同的態度。這又是一個範疇（思想的源頭最遠，已有二千年）。

(2) 創化的認識脫胎於孔德、柏格生、威廉傑姆斯、羅素和今日英、美實在論和層創論的思想，包容進化與理想的觀念而揚棄其偏見，應以柏格生、羅素等為代表。承認戰爭亦有推進文化的作用，是創化的、進步的、向上的、革命的、戰爭的目的，應使人類的文化、道德更有完美的發展，未來世界更有長足的進步。凡束縛阻礙此種進步而使社會返於軍國主義的獨裁與愚昧的統治的，都是社會的蠹蟲、人類的公敵；對於此等反動勢力，均應打倒之，消滅之，使不為進步之害。這是二十世紀的新思想（指對戰爭而言），發起於第一次大戰之後，而成熟在目前民生國家的朝野之間，羅斯福、華萊斯、威爾士、貝納斯、拉斯基及多數的名人多支持之。這一派同前一派（因果的）的看法一樣都注重文化、道德和教育的效果，都肯把眼光放遠，不願目覩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來臨。這又是一個範疇（思想的源流最短不過百年）。

以上的思想範圍是目前人類對於戰爭認識的兩個正面，四道主流，相互交織，牽制，颉抗；前二

者利己，後二者利他；有些代表侵略主義，有些代表反侵略陣線，但其中尚有矛盾。侵略陣線中未必全無利他的思想，反侵略陣線中尤不免利己的思想。德國代表侵略陣線，但德國人民卻多受康德、里格爾、費希特諸氏的理性教育的薰陶，不盡都像希特勒、魯登道夫、戈林等「超人」。英國是反侵略陣線的要角，而英國對於戰爭的傳統看法是屬於功利主義的，三民主義是後二種思想（儒家思想與創化論）的結晶，而三民主義目前猶缺少發言的實力。

所以，從思想的觀點上看，一部人類的戰爭史便是哲學對世界思想的決闘。馬克思、尼采、達爾文諸人生前都是彬彬的學者，表面上看來頗不似是戰爭的製造者，但他們隱藏在心中的創造的火焰卻間接燃燒了一些實際行動的野心家的幻想。於是原是學術上的主張逐一變而為政治上的計畫。個人的觀念受到部分人的信仰，即成為社會運動，遲早會以戰爭或變亂的方式出現。「資本論」、「大陸政策」、「日本改造法案」、「我的奮鬥」四書之變為俄國革命、日本侵華、二次大戰，還是較明顯的榜樣。

基於上述這些論證，我們對於目前戰爭的認識，可以下論斷：此次戰爭的基本性質就是一種思想戰；這次戰爭的價值，也就是思想問題的價值。在目前全球各地的戰場上，正有六七千萬的青年人在緊張熱烈地過着戰鬪和生產的生活，他們的心目中都懷抱着一種理想，以為他們的努力不是白費的。這幾千萬個心理單位的電流所匯成的龐大的合力，定有深遠的影響，足以重新估定戰爭觀念的價值，也就是改造我們這個愈來愈進步的世界。在以後幾章裏，筆者還要提到德國

戰略的許多優點問題，但這種優點所代表，祇是一種技術，而不是內容的根本。技術是盡人都能學會，還可以加以改良的。所以戰略的優越亦是時間性的。祇有站在戰爭的根本問題上以求事件的解決，纔是一勞永逸的大計。對方一切都好，但其所根據的思想概念是站不住的、反動的、逆流的、自私的、包藏危機的、難免循環律的，所以他們戰士的血亦必是空流，他們的力量亦必是白費，到頭一定是要被一個鉅大的思想壓力配合着武力的攻擊所壓倒。到那時歷史自會介紹戰爭的真正的價值給後代看。

這次戰爭開始時期所見到的戰爭的熱狂的消失，便是這次戰爭的最自然的表象。戰爭是製造出來的，逼出來的，不是非戰不可的。故「戰敗主義」的促成，亦必不難，所慮的還是善後問題而不是過程問題。新的勝利一定要由比較俾斯麥更有政治遠見和道德實力的人物來領導完成，我們一定不能再來一個凡爾賽或相反的馬關，否則便是後一時代的罪人。

因此，這次戰爭一定要比上一次的進步，纔是文明社會的進步。

綜上所述，又可簡單歸納如下：

在狹義的戰爭思想上，是軸心國方面占了上風，無論在精神力、人力和物力的準備和運用上，都有一種通盤的計畫和打算是思想領導戰爭，不是戰爭推動思想。戰爭與思想力的配合，總是納粹早期勝利的形而上的因素。豪斯霍佛博士的畢生的努力，將為世界留下一個空前的榜樣。在廣義的戰爭思想上，同盟國方面雖然擁有更豐富的實力，但是亦必須跟隨此路前進，以思

想力來領導精神力、人力、物力，方能負起歷史的使命。

第三章 戰略思想的演進

第一節 現代戰略的概念

戰爭與戰略的分野——科學與藝術——科學的傾向——戰略方案的形成——若干史例——軍事的來源——藝術的表現——「天才」與「人才」

戰爭學與戰略學的嚴格的分野，是困難的，正和戰略、戰術一樣。但大體上，戰爭問題的本體論與認識論應屬戰爭本身的範圍，而戰爭的方法論則屬戰略的範圍。所以戰爭的方法論亦即為戰略的本體論與認識論，而戰略的方法論則為戰術（即戰術的本體論與認識論，戰術的方法論是戰鬪）。

戰爭方法的基本原則有二：一科學、二藝術。

科學包括精神、物質、政治、經濟、人力、物力各種的因素，藝術是用兵作戰的技術，科學是死的，藝術是活的；科學是實的，藝術是空的。戰略必須兩者兼顧，先求穩當，次求變化，終加調整，憑科學必

至刻板被動，偏倚藝術，更會盲目浪費。故孫子曰：「不可不慎！」

作戰方略的決定，必須建築在科學的堅實的基礎上，而配合當時科學上、社會上各方面的條件。除軍事範圍本身的因索外，舉凡當時科學發明的程度、政治形態的關係、生產技術的條件、民族性質的成分等都應在考慮之列。所以現代進步的參謀本部，都包括大批對於各種問題具有專長的專家學者和技術人員，不能再讓單純的軍人來武斷從事。當第一次大戰時，德國參謀本部僅由毛奇、興登堡、法根海諸將負責蠻幹，致吃了很大的虧；這次改由豪斯霍佛的政治地理學院領先計畫一切，戈林、戈貝爾、里賓特羅夫、希姆勒、季特爾等人分工合作，殊途同歸，便在四十天內擊敗英、法、比、荷四國。

戰略思想形成以後，便要起作用；但社會上思想龐雜，意見紛紜，新的思想並不一定能夠得勢。事實上必須經過一番磨難，有贊成就有反對，經過修改就會變質，結果也許根本「吾道不行」！或延留到後代（纔被有心人偶然拾起；或失之過偏；或被執行者誤解，或以因襲過久而成惰性（便要草菅人命）。種種稀奇現象，冤枉怪事，史不絕書。可見科學的即現實環境的把握運用，實似易而實大難。

當第一次大戰時，西部戰線僵持了三年，最少冤死了三百萬青年，事前除一德籍教授有預感外，誰都沒有想到。許立芬亦沒有料到他的迂迴戰略會被小毛奇削弱到不成樣子，而失掉戰勝法國的機會。拿破崙最威風的時期，是在一七九六年，曾在一週之內，轉戰如走馬燈，達成六次各個

擊破的奇蹟。但目前已知其內線作戰的原理，是竊自無名的布爾塞、桂貝爾二氏。福勒少將（世界機械化戰略的發明者）在英國朝野奔走呼號二十餘年，到頭是眼見德國竊取了他的戰法，將英軍擊敗！這都是使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政治上，是莫索里尼發明法西斯帝，結果出了希特勒來做他的主子）。

事實上，個人的思想要和社會上千頭萬緒的因素確切適應實在祇有極小的可能性（主要是缺乏情報），但軍事思想比較任何思想都更重實驗，流血的經驗亦同其他經驗一樣，是積漸而成的。故若有稍具慧眼的「天才」們能在千頭萬緒之中，扼要地見到一二點，預算到大勢所趨的途徑而掌握其樞紐，發揮其心得，活用其手腕，增強其效果，以愚弄一代之人，這便是所謂軍事藝術了。

所謂戰略的藝術性，就是堅確的把握科學的因素，更以藝術的手腕將其活用於實際的戰鬪，發揮標奇立異的戰績之謂。

戰史上的榜樣如韓信的木罌渡河，鄧艾的絕險平險地，澳尼拔在卡內之包圍，大佛列德在勞登之側擊，拿破崙在奧斯德力此之突破，許立芬經荷比的迂迴，毛奇在美次之外線作戰，傑克生在仙南道谷地之內線作戰，希特勒在色當的突貫作戰，都可以見到獨到的精神魄力和機變敏活的處置，有非常人所能及得到的長處。

戰爭藝術亦和藝術創作一樣，要求「天才」。但天才的產生祇能期諸偶然，不能呼之即來，亦

難從小訓練，自不可靠；可靠的還是科學基礎的經常建立和合理的配備運用。這就似求「人才」，即夠，不過卻需要多數健全的「人才」，最好是把「人才」組合起來，予以適當的配備而要求他們提供適切的力量；希特勒便如是辦（豪斯霍佛博士的政治地理學院）。

所以，戰略的認識論在原則上祇有兩個問題：一是科學的條件問題，一是藝術的運用問題。我們為求系統地討論這兩個問題起見，先在下一節裏看一看這兩個問題所給與近代人的經驗，然後在更下一節裏再來歸納它的內容。

第二節 現代戰略思想的背景

唯物論的傾向——唯物論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和目前的科學——新時代的特質——新的科學概念——思想領導的重要——若干史例——戰略思想的演進——克勞塞維此——恩格斯——福勒杜黑——賽克特——各個段落的躍

人類戰爭經驗已有三千年，現在截去二千八百年，僅以最近一百五十年的經驗來看，在十九世紀中葉，唯物主義全盛時，唯物派對於軍事問題的代言人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裏，一再提出關於生產力影響戰爭形態的問題，以充唯物論者攻擊當時唯心論的武器。後來列寧在他批判克勞塞維此的摘記裏面，亦有此類見解。其目的是求建立一種唯物辯證法的軍事科學。

(事實上已在蘇聯成立)。這些唯物論者的軍事觀點，固不爲國際軍事專家所重，但是基於首次大戰的經驗，事實證明較有物質基礎的德國陸軍實常居優勝的地位，比較唯心的法國陸軍爲有遠見（按即霍夫曼〔德〕與格朗美松〔法〕軍備計畫的優勝劣敗）。所以在首次大戰以後，各國軍事專家如福勒（英）、杜黑（意）、賽克特（德）、阿爾克斯尼斯（蘇）、米契爾（美）、石原莞爾（日）等，無不提倡科學化與技術化的裝備改革運動，形成了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間國際軍事思潮上的所謂「現代主義」，而在政治上則是不滿現狀的少壯派影響所及，非常鉅大。這次大戰中的「閃擊戰」，便是基於此種平時秘密準備的基礎而實發的一種現象，不是偶然的。

所以現代軍事思想的主要經驗，就是一種唯物的傾向，而且是過度的機械的傾向。因此，我們也必須深刻地利用經驗來剖析這種「唯物的經驗論」，纔能追溯較舊的歷史。

機械唯物論者的缺點，不是因爲他們強調物質作用的鉅大，而是因爲他們過於蔑視精神的因素，因此而失掉戰爭原理的平衡性。過去的戰史早已證明凡能活潑地握住精神力、人力、物力的「三位一體」的條件，並能精確地發揮其互爲因果影響的效力的，纔是真正站在科學的堅實的立場上，而無所遺憾。恩格斯生在十九世紀中葉，那時正當青年的唯物論者甫從黑格爾的唯心論的大家庭裏決裂出來，充滿創造的野心與鬪爭的成見；同當時進化論者之對於神學、自然主義者之對於浪漫主義者的破壞一樣，都是站在當代自然科學所能供給的機械的宇宙論的許多「偽證」（即原子論的時代）上面，而自欺欺人，機械地武斷了一切的。這種「偽證」在科學界上冒充

真理不過五十年，到一八九五年湯姆生證明電子的存在，一八九六年柏克勒爾發現放射現象，一八九八年居禮夫婦發現鑄質，一九〇〇年普蘭克發表量子論，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提供「相對論」的看法以後，便已不能存在了。今日我們的科學「真理」已不是十九世紀時期的真理，在十九世紀中葉時，「真理」是機械的、明顯的、自大的、滿足的，那時的世界看來似不過是一種力學與原子論的龐大的機械機關在萬有引力、以太、電磁學的權威的學府裏面。在此學府之中，已經有人「進步」到提議用化學元素來製「人」！真理既是那樣簡明易解，那麼機械的人類當然祇是一種「食的動物」（費爾巴赫語）。戰爭自然祇是物質的自然辯證法的社會反映，確乎再無容納精神原素獨立存在的餘地。故馬恩二氏的「上層建築」之說，確是基於當時科學知識可能達到的限度，是當時機械的科學觀所能形成的機械的哲學觀，並非無所依據的（馬氏的經濟學是根據他的社會觀，他的社會觀的根據便是當時的科學觀），但是目前的科學基礎已非十九世紀中葉的科學基礎，已非牛頓、達爾頓、法來地、馬克斯威爾諸氏的萬有引力、原子論、電磁學、光波學的時代，而為湯姆生、普蘭克、柏克勒爾、愛因斯坦的電子論、量子論、宇宙放射論、相對論的時代。過去的科學是靜的、機械的、絕對的，可能把握的，目前的科學已是動的、變化的、相對的、捉摸不定的。十九世紀的科學家們似已登峯造極，直探真理的堂奧而無可再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科學家卻發現過去的「真理」或許祇是幻想，建築在錯誤的偽證上（如力學的主觀性及以太的假定等），宇宙的真象實是一種變化莫測的電的波浪與放射，直到目前尚非天文學家與物理學家的探索所能

把握其端倪，而祇好讓愛因斯坦等站在數學的思想作臆斷的推定。因此科學與哲學的界限又相互接近，而唯心與唯物的爭辯遂成爲過去的浪費。這種新的科學基礎已經反映在創化論的哲學與表現派的藝術上，更反映在鐳的應用，廣播與無線電攝影的發明上，而成爲這一個時代的經驗。其原理自非百年前的馬恩及其社會所能認識，更非機械唯物論的因襲者所能領悟！

因此，假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經驗亦應站在觀感世界可能感覺的物質基礎上的話，則此物質基礎的終極，亦應不是十九世紀的科學所宣布的堅實的原子單位，而爲一種較原子更小的飛躍的、活潑的電子所化成；此外還有各種奇特的放射作用可以變動其性質。因此而得到的結論，便應是：思想屬腦，腦屬物質，物質屬電，電能放射，倒轉來，放射也就是物質，也就是思想，放射之不能見正和思想的不能見一樣。電既然是物質的終極，則精神和物質便祇有質能的分別，沒有本體的不同，心同物也就不必分家了。這種新的看法，就是目前的科學家們所能把握的宇宙現象。我們儘可以認爲思想價值，就是科學價值。思想和物力（廣義的）在戰爭中的關係，更必須永遠地由思想來了解物力，領導物力，運用物力。什麼時候思想的領導失敗，戰爭便會發生極大的災害。物質之爲物，如一妖怪，不善使之，必爲所噬！

所以，所謂軍事的科學基礎問題，實祇是具有先見之明者預感到「真理」的趨勢，把握其最有作用於當代社會關係的各種因素而發揮其價值於重點方面之謂。

關於此種寶貴的經驗，在橫的方面，參舉出幾個明顯的例子：

(一) 拿破崙的運用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羣衆心理。

(二) 拿破崙的運用格里波伐爾野砲和露營，使運動戰達到最高的發展。

(三) 毛奇的運用火車來輸送他的軍隊。

(四) 德國參謀本部的未兌現的迂迴計畫（一九一四年）

(五) 魯登道夫的幾乎打破西線僵局的滲透戰術。

(六) 希特勒借用多人意見所造成的閃擊戰。

(七) 中國抗日戰術的違反原則的收穫。

再就縱的方面，將此一百五十年的歷史經驗分為幾個代表的階段來看：

十八世紀末期的「狂飆運動」，發起於法之魯騷、德之哥德。它所代表的是歐洲社會反專制反封建渴求自由平等解放，要求擴張自我，創造環境的羣衆的潛伏的心理。法國大革命更燃燒此種心理，拿破崙則一舉解放之，使人心變成怒濤，一發不可收拾，到處破壞舊的，創造新的。戰爭也是隨着這種革命的浪潮進展，把歐洲人的精神都提升到最高點。軍人走上戰場都有英雄氣概，將領們多喜自命為「天才」，專好出奇制勝，不甘凡俗。故戰術原則的發明，軍隊建制的確立均有當時的影響。這時已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初期，但機械工業還不普遍，對於物力的應用是有限的。富爾吞首先將輪船和「潛水艇」的模型獻給拿破崙，拿破崙都不能用，後來法軍和英軍在西班牙作戰，英軍隱在高地後面，法軍也因為沒有曲射砲不能打他，以致失敗。總之前後十五年的拿破崙戰

爭，可認為是一「人力」占主要因素的階段。「人力」的應用是龐大的戰術是新奇的，攻擊精神是非常旺盛的，對於後世的影響是深遠的；卻完全缺乏現代的科學的或物質的複雜關係，其理論是唯心的；其行動則是浪漫主義的。

此一階段的戰爭理論權威，是克勞塞維此（黑格耳學派）。

次之，十九世紀中葉自然主義的勃興，是基於當時科學與進化論的發明而興起的新的浪潮。這時代的代表精神，是對於科學的自信，物質的崇拜，以為人定勝天，機械文明可以解決一切，所以反對唯心，反對空洞的政治口號，反對思想的價值。德帝國參謀本部把握此要點，埋頭從事較合理的準備，故能有對奧、對法兩戰與首次大戰時期諸戰的勝利。這個時期德國人首先所把握的科學基礎是鐵道（一八三〇年）、電報（一八三七年）、煉鋼（一八五六年）、機關槍（一八八八年）、黃色炸藥（一八九六年），以及較後的電話、無線電、航空器等（均在二十世紀初年）的發明與運用，換言之，即德國的毛奇與霍夫曼等，是比較地認識了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煤鐵時代」的要素（物力），故亦有比較的成就。首次大戰末期的繼續發明與運用，亦應併入此階段。

此一階段的戰爭理論的預言者，可以認為是恩格斯（馬克斯派）。

第三時代是基於未來主義與表現主義的先兆而起的新的科學時代。這時西方人的見解已由絕對的唯物主義回到相對的唯物主義。新的科學上的發現刺激了現代直觀的見解的興起，於是又有新的理想與新的浪漫情緒。尼采的信仰代替了達爾文，列寧托洛茨基代替了馬克斯、恩格

斯、柏格生、羅曼羅蘭、代替了左拉與易卜生在生產技術（物力）方面是油、電代替了煤、鐵。在政治方面，則有法西斯與俄國國內戰爭的「英雄主義」。在人力的素質方面，則大量地傾向於爲理想而組織奮鬥，全球充滿政治的軍隊。在軍事理論方面，則風靡所謂現代主義，預言一高速度的戰禦的將臨。納粹德國、意大利、英國、蘇聯、美國都不約而同的向此道路邁進，結果是納粹在競走中獲勝，因此而有閃擊戰與今日的局勢。

這一時期的理論的代表者是希特勒（精神力）、杜黑、福勒（物力）、與賽克特（人力）等（接近創化派）。

基本上所述我們認爲戰略的基礎，是分別的基於科學與社會的段落的特性而形成的。在科學的演進上，是由原子論到量子論，由引力說到放射說。社會方面的演進，則是由封建的社會演進到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這一百五十年的經驗是明顯的，可以歸納爲下面的概念：

戰略學的來源是發自社會條件所反映的意識上，此種意識又是基於科學知識所達到的限度。因爲近兩世紀來，科學進步的疾速，一再推翻其前身的定律，故社會條件恆有急激的變革。社會條件與社會意識轉變，戰略亦必然演進，從封建過渡時期到帝國主義過渡時期，前後約有三次革命的躍進：第一次是拿破崙到毛奇的時期（一八〇〇——一八七〇），第二次是毛奇到魯登道夫的時期（一八七一——一九三〇）的時期，第三次是魯登道夫到希特勒和希特勒以後的時期（一九三〇以後）（在理論的樹立上，即是克勞塞維此恩格斯與創化派的三個階段）。但是

其中有一原則，即新的戰略原則的創制，必須特具慧眼，邁步在每一個時代轉變階段的機微的先前，而不可追補。在時代條件業經明顯的轉變之後，不然就不能達到奇襲的效果；如果條件早已擺在眼前，而眼睛卻是瞎的，則必然落伍。所以思想終為戰爭基本的動力。

第四章 戰略問題的關鍵

在上面的論證裏，已大體達到足以明瞭戰爭與戰略上一般關係的界限，這一章所要引論的，是戰略本身上的關鍵問題，並且避免一般軍事書籍所常引證的普通問題，以求扼要。

第一節 殲滅戰論

現代基本戰略為殲滅戰略——歐洲封建時期的戰略——現代殲滅戰的肇創——法國革命時期的攻擊精神——拿破崙的貢獻——歐戰時期唯心論的失敗——東線殲滅戰的價值——兩線的陣地戰——生命的浪費——機關槍的權威——幾個失去的戰艦——魯登道夫努力的失敗——三個人的影響——閃擊戰的來源——拿破崙戰略的機械化——閃擊戰的前途

軍事戰略本身的範疇有二：一是殲滅戰，一是消耗戰。

殲滅戰是先進的戰略兵凶戰危，決非兒戲，一切戰略在根本要求上，莫不以迅速解決為其理想，但是基於各時代社會條件的不同，故殲滅戰的特性亦有很大的分別，或偏重在人力，或偏重在物力，各視其基本不同的要求而定。近代的殲滅戰是自法國革命開始，在此以前歐洲封建制度下的社會條件是不容殲滅戰的理想存在的。主要的是因為當時歐洲的軍隊祇是帝王私人的武力，是皇室政權的保障，訓練甚精，靡費甚大，而諸侯的金庫則有限（那時專講演體面，一兵的制服有值二百法郎者），若是隨便犧牲了，便無以為繼。且其兵卒的材料，亦大多是招募而來的傭兵，數量甚少，忠實堪虞。戰鬪的時候，常常要用貴族的子弟編成的騎兵加以監視，以免臨陣脫逃，紀律涣散，故決無從事速戰的可能（其他方面還有許多限制的條件，如當時的兵器給養制度以及地形等）。但法國革命以後，情形便完全不同。法國的革命軍是由有理想，有政治覺悟的分子所組成的，是「揭竿而起」的羣衆的解放的戰鬪，是一種慷慨赴死的壯烈的運動。戰爭已不再是帝王互爭雄長的「武力表現」，而是大眾生死存亡的問題。法軍如不努力殺敵於戰場，便要被敵軍判以叛君之罪送上絞刑臺，所以人人決死，轉戰如狂。這兩個時期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好借用兩位代表不同時代的將領的名言來作一對照：

薩克斯元帥（代表封建時期的意見）曾謂：「余望終其生作戰而不會戰（認為會戰祇是一種拙劣的不得已的下策）。

拿破崙（代表法國革命時期的意見）則曰：「我今天最盼望的事就是立即打一場大會

戰！

拿破崙時期（至一八七〇年為止）的殲滅戰是一以人力戰為主的時代。當時各國都已採用徵兵制，故兵員同人口的比例頗大，每次作戰所使用的兵員約自五十萬至百萬不等。大會戰有瓦格蘭（一八〇九）、波羅底諾（一八一二）、萊普齊許（一八一三）、蘇佛里諾（一八五九）、薩多哇（一八六六）、美次（一八七〇）、色當（一八七〇）諸役，每次會戰集結在戰場上的兵力自二十五萬至五十萬（萊普齊許）不等，每次會戰的時間自一日至三日不等，每次會戰的戰鬪正面自二哩至十哩不等，傷亡的人數自五萬（瓦格蘭）、八萬（波羅底諾）、至十萬（萊普齊許）不等，俘虜的人數自八百（波羅底諾）至十七萬（美次）不等，都是非常激烈慘酷的作戰。試觀拿破崙在進入滑鐵盧會戰以前的誓師辭的精神，便可見一般。這一誓師辭結尾的話是：

「……今天已到了每一個法蘭西人非勝即死的時機！」
永遠奮鬥！

在一七九二年第一次抵抗普、奧的進軍時，法國的革命領袖之一丹頓說：「奮鬥呀！絕對奮鬥，我之隴畝！」

在這一種高度的昂揚的攻擊精神與敵愾心之下，一般的筋肉運動是非常快速的，平均一天的行軍總可以達到八十公里以上，常可一連強行三日，一週不等。因此大角度的迂迴、超越追擊，在

機動退卻等是常有的事。同一機動中的部隊的內線作戰，可在一週之內達到各個擊破敵軍六次的紀錄（一七九六年八月的意大利戰役）；一個騎兵集團的長追作戰，可達一千四百里（一八〇六年繆拉騎兵集團自耶拿戰場至波羅的海）；一次一百八十度的旋迴運動，可以犧牲五千而俘敵六萬（一八〇五年烏爾木戰役）。總之，這時期主要的作戰目的，便是日後克勞塞維此所謂「殲敵主力」的原則，是單純的武力戰，是「文明」的戰場戰，目標祇有武裝的敵人，民衆不會遭殃的。通觀此八十年的期間，未聞有大規模的殺戮非戰鬪員之事。

第二個殲滅戰的時代是歐戰（事前日俄戰爭已有先兆）。這時歐洲的社會條件已進展到資本主義末期的階段，各種科學與技術上的進步早已大大的減低了人力可能發揮的力量。鉅大的生產潛力已奠定物力戰的基礎。十九世紀初葉的英雄的、浪漫的作戰已無存在之餘地。可是，各國參謀本部的頭腦卻平均落伍了五十年（德國三十年，法國七十年）。他們祇有頭腦，沒有眼光，從不觀察現狀。克勞塞維此的戰爭論仍是普及的經典，拿破崙的鬼怪則牢牢地附在霞飛、福煦一批人的身上不去，規定法軍「仍着鮮明的制服揚旗鳴號揮刀呐喊突進，軍官不下馬，隊伍不准臥倒！」總之，就是那時候歐洲的戰略思想，是先與時代脫節，後被時代拖着走，始終搶不到在時代的前面。除掉德國的霍夫曼上校等一二人曾經注意到機關槍和重榴彈砲的新興的價值外，其餘大部分的戰爭指導者都是盲目的，都是在追懷憧憬着過去時代的光榮的夢境。這結果自然除掉草菅人命之外，別無他途。因為德國軍隊每團有八挺馬克沁機關槍，並有些重砲，故法國在開始攻擊

的頭一個月裏便折損二十五萬人！巴黎的保存是以三十萬人的代價換取的（第一次馬恩會戰），而德國的偉大的人力迂迴的計畫，亦未能兌現（基於執行者的錯誤想法）。此後便出現了機關槍大王和慘壕的迷宮，龐大而無收穫的人力殲滅戰在西線的雪裏算告一段落。雙方的損失都是非常嚴重，起碼一半以上是冤死的——冤死於英雄的、賭博的「豕突主義」。這是唯心論沒頂於血泊中的慘敗！

殲滅戰在西線雖然失敗，在東線則有很大的表現。這是因為東線的主要交戰對手，是俄、奧二國，都是比較落後的國家，同時東戰場的地理條件又比較適宜於運動戰，雙方都保留機動的條件，所以一切克勞塞維此的或拿破崙的落伍了的理想，凡在西線要碰釘子的，在東線都能按照一百年前的模型照樣的製造出來，而且以更恢宏的姿態出現。但東線三年多的殲滅戰，雖有興登堡（魯登道夫）、麥剛生等代表拿破崙和毛奇的精神，對於裝備落後的俄國軍隊有很大的戰術上的勝利，確曾震動一時（目前我們已經明瞭當時德軍所以極占戰術上的優勢，主要還是技術裝備的優良所致，如坦能堡一戰便是利用一百門重砲的火力摧毀了俄軍左翼，因此促成包圍），可是東線所能提供於戰術思想的因素是有限的。坦能堡（一九一四）、洛次（一九一四）、馬蘇爾冬季的會戰所代表的實義，也祇是拿破崙殲滅戰的重演而已，對於二十世紀的各種條件是無關係的、無進步作用的、無參證價值的。西線的唯心論者的理想主義頭顱便被打得粉碎，以後也一籌莫展，但窮變則通，因此纔得到經驗和教訓，因此戰爭纔得以更向高級的階層發展。東線的唯心

論始終維持克勞塞維此的信用，始終輕視物力，唯以人力取勝，故結果祇提供一些空洞的戰史。

拿破崙式的殲滅戰在一九一四年雨雪霏霏的冬季裏失敗之後，德國將領們纔開始注意到克勞塞維此著作的缺點；同時拿破崙的鬼魂亦捨棄霞飛而去，遺留在西線的是一條延長四百英里的戰線，雙方各有二百萬人針鋒相對，難越雷池一步。因此真正在那裏打仗的，便是後方的工廠而不是前方的部隊。對於人力崇拜的心理一變而為過度的仰仗物力，最初是英國，後來纔是法國和德國，都變成「唯武器論」者，將軍們變成了偉大的「戰爭公司的經理」，士兵們則變為造房子（堡壘）與開礦（陣地）的工人。這種大規模的趨向，尤其在一部分德國的唯心論者因為不服氣而推行的最後一次的人力攻擊（第一次依帕之戰，那時德國青年高歌「德國，德國，高出一切」，宛轉就死），失敗之後，更其變成定論。

自一九一五年以後，協約諸國開始推行其物力的「擂擊戰」（這名詞是作者起的）。所謂「擂擊戰」的辦法，就是把全國所有的煤所煉成的鉅量的鐵與化學工業所能生產猛烈炸藥，儘量的擂到對方的頭上去，以為一下子把對方擂平了，就能夠兵不血刃，堂堂邁進。這一種純粹依賴物力的戰略原則，不幸很快的便推廣為習慣的戰法。自一九一四年冬季到一九一八年春季為止，法軍一共大擂了六次，英國大擂了四次，同期接受對方反擂了三次，合計是經歷了十三次消費龐大物力的戰略攻勢。其中較著名的有兩次的香檳會戰（一九一五）、凡爾登會戰（一九一六）、森姆會戰（一九一六）、哀因會戰（一九一七）、佛蘭德斯會戰（一九一七）等，每次消耗

的砲彈約自七十萬發至一千三百萬發（哀因會戰）不等，連續砲擊的時間自三日至十日不等，攻勢延長的時間自一個月至四個月不等，步兵突進的縱深自二哩至二十哩不等，每次會戰傷亡的兵員自十萬至六十萬（森姆會戰）不等。其規模之宏大與決心的殘酷，可謂駭人聽聞。單計其中英軍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對佛蘭德斯正面一次的砲擊，便在七天七夜之內，用砲三千零七十九門，連續射彈四百二十八萬三千五百五十發，計重十萬零七千噸，價值二千二百萬金鎊，即等於把二十七艘各重四千噸的輪船或五百四十列各重四百噸的火車擋在德軍的頭上（當時希特勒以中士班長的身分參加此戰，亦為被擋者之一），而德軍對於法軍凡爾登戰線的「反擂擊」，亦極其猛烈（一週內用砲二千，射彈二兆）。這種大量的鋼鐵之山的熔煉與飛散，就是德國魯爾區的物資潛力對英國密德爾塞克斯區的物資潛力的對抗。直到美國賓西爾伐尼亞區的物力增強了密德爾塞克斯區的生產力之後，魯爾區方纔漸漸支持不住，終致國內餓死了數十萬人。所以完全是一個經濟和材料的笨幹、死幹，雙方都依賴鋼鐵和火藥的重量來交替相互的壓倒，什麼戰略都談不上。在此鉅大的鎔爐之中，人不過是螻蟻一般的燃料，終日匍匐泥土堆中如鼠如囚，遲早轟成粉碎一點聰明才智都施展不出來。談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猶可想見當年的情景。據說當時雙方將官以上的人員，都無須乎到前線，故有一位英國兵寫了一本小說，叫做「將軍死在床上」，以洩胸頭的鬱憤。又當佛蘭德斯大戰時，連日淫雨，佛蘭德斯又是出名的低地，因此不斷湧進的英國步兵，不久都陷到泥淖裏去，泥肉不分。當時有一位英國將領「偶然」駛過，目睹此種慘狀，恍然大悟，流

出眼淚來，對人說：「上帝啊，真不曉得我們的人是這樣幹的！」這句話就是能夠代表當時協約國的戰略。

本來西線的陣地戰是應當歸在消耗戰的範圍裏的，但是我們為順序觀察人類因為無法把握戰爭而如何可怕地「造孽」起見，所以稍為變通排列的次序，繼續分析下去，以見歐戰戰略思想的因果的發展。

西線協約國的「搖擊攻勢」前後延續了三年，折兵五百萬人，德國因取守勢，故犧牲較少，然亦在三百萬左右。這空前屠殺的結果，是發現戰線的進出始終未能超過三十哩，三萬門大砲的威力始終制服不了隱藏在陣地網的迷宮裏的「機關槍大王」。在戰術上是一種浪費，在戰略上更是延長的頓挫。所以西線以後二年間的一切舉止，都是在那裏實驗如何纔可以破這堅壞火網的「陣」，如何纔可以重新回到空地上作戰。馬克沁在發明他的「六六六」時，當預計不到其利器會成為西線最有效的因素。機關槍的權威始終保持下去，無論用多少砲彈填埋覆壓，總有死不盡的射手存在，等到步兵密集出現，便大倒其霉。三年經驗的總和，是證明一切兵種祇要是血肉之軀，便決無壓倒機關槍的希望。機關槍也決不怕它。一切攻勢到最後都是徒勞，都不能維持到貫通敵陣的全部，通常是「蠶食」到三分之一的程度便被堵住，又得調集千門大砲，狂轟一週，連爬帶滾從頭幹起！那時流行的「攻陣」原則，大別有二：一是「蠶食」，一是「鯨吞」。鯨吞的方法舊的已經慘敗，新的則尚未產生；「鯨吞」的實驗更證明無大希望，而且特別的浪費解決戰爭之道，可謂瀕

於絕望窮變則通，到後來纔來了坦克車，但又來得太少，而且不受信任。海格將軍總認為打仗打到這般地步，真不成樣子（惡其形也），豈不喪盡軍人雄武的風概，與其用之，不如自殺！所以費盡唇舌，第一次僅用四十九輛，爬爬都跌到地坑裏去了（一九一六年冬森姆前線）。奇襲的機會輕易放過，當然一去不返。其後雖用三四百輛拼命蠻幹，企圖恢復「鯨吞」的理想，但德軍已有應付之法了。坦克車在首次大戰中始終不起決定作用之故，即係因此。試思若是第一次便出現一二千輛的話（用佛蘭德斯會戰一次所耗的砲彈便足夠製造三十噸重的三千三百輛），則魯登道夫將如何的狼狽，確是有趣的幻想，值得深思回味的。反過來，德軍的使用毒氣，亦不徹底、不科學、不明關鍵之所在。當其第一次在依帕作雲狀放射時（氯）事出不意，英法兩國軍逃得一塌糊塗，左翼門戶洞開，一日未守！而德國太子卻看戲似的，有趣的一笑，便作罷了。假如當時看破戰機，揮兵跟進，則領駐英吉利海峽，易如反掌，又何容此黑子彈丸之地，日後蠻攻三載而不能下乎？凡此都像有命運擺布似的，使思想滯塞不通，「陣地戰之謎」始終無法揭破。

從一九一七年冬季起，主動落在德國手中，這時魯登道夫利用虎爛爾將軍在東線里加之戰實驗過的「滲透戰術」和瓦斯戰術的奇襲合併使用，企圖打破西線的僵局。但他忽視了坦克車的價值，所以他用盡最大力氣達到西線戰局轉捩關鍵的頂點時（一九一八年四月一日），卻因為缺乏持久的衝力而鬆懈下來，僅以九萬俘虜的戰術勝利而滿足。歐戰的「戰略思想的作戰」，便如是不完滿的結束。

第一次歐戰的心理結果，有嚴重關係的是嚇壞了一個人，氣死了兩個人，嚇壞了的是馬奇諾上士（後來的法國陸軍部長），氣壞的是福勒上校（少將）和魯登道夫上將。馬奇諾出身行伍，卻勾爛泥場中，見聞之廣，不過傷亡之慘和陣地的牢不可破，故一朝得志，就憑其直覺強調現代築城威力的偉大，而致力於馬奇諾戰線的實現。福勒則不同，他是英國坦克車部隊的參謀，滿腹科學經綸，無處發洩，眼見大好戰機，一再坐失，認為都是坦克車不得志之故，憤慨填膺之餘，因此著書立說，終生從事於機械化理論的建立，希望能有一日達到其科學化英國陸軍的志願。魯登道夫服膺尼采，自命「超人」，四年以來，鐵面鋼心，從不一笑，成為全軍的恐怖；但操勞既久，體力難支（據路德維希說：奧登堡與魯登道夫同在一堂指揮，與登堡無論戰局如何嚴重，夜間鐘鳴一下，必定安睡，鎮定自若，魯登道夫則不能睡），戰敗消息傳來，「超人」居然暈絕於地，口吐白沫，不勝其慘！他在回憶錄的最後一頁裏，記着：「今日告別共事四載之幕僚，簡單致詞之後，我全身抽動，驅車而過列日城，回首當年初建戰功於此的情景，非常感動：」這三位深受首次大戰刺激的人，心中都有放不下的塊壘，都潛伏着未滿足的欲望，遲早總要爆發出來，而有所表現，這結果便是二十年後的「馬奇諾防線」和破此防線的閃擊戰略。

其餘關於閃擊戰的問題，前已扼要論過，不再多說。魯登道夫在一九二三年參加納粹陣線，僧城大衛暴動失敗，昂然冒敵火邁進，證明他是唯一不怕機關槍的人（當時希特勒狼狽臥倒，致傷其臂）。十年以後，他眼見希特勒已完全採取了他的經驗與意見，並有後起者以繼其志，便撤手而

去，沒有親眼見到德軍的成就。故閃擊戰的成功，實為德國參謀人員二十餘載心血眼淚的結晶。它是代表這個油電時代的戰略，是時空不分的相對論，時代的產物。從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止，確曾一度接近戰爭的真理，成為最新的殲滅戰略，但在最近又有衰頹之勢，尤其是對蘇的攻勢，又有消耗戰的傾向。這是證明納粹的軍事思想力已經耗盡。

結論是：閃擊戰的特性，是現代科學文明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混合產物，它與歐美西線的僵局判然不同之點，就是確能把握「三位一體」公律的原理而應用之。在精神方面，對內以政治紀律嚴密日爾曼人的團結，對外大量的推廣「攻心戰」。在人力方面，是以國社黨的黨軍做堅強的基本，配合優秀的職業軍人和多數的技術專家，造成一支前所未有的具備多種複雜能力的軍隊。在物力方面，則由於多年的準備與有計畫的充實攻進（包括掠奪），故能在質量方面都超過它的對手。這一個新的「三位一體」的力量，是以拿破崙殲滅戰的昂揚精神付諸實施的，故戰鬪意志堅強，將領都很年青，在戰術上，更以萊希腦的裝甲師代替了繆拉的騎兵，密爾許的俯衝轟炸隊（史都卡隊）代替了馬爾蒙的「大砲連」，機械化的速率代替了法國革命軍兒郎們晝夜強行的速率。所以希特勒戰略的最合式的歷史的與科學的比喻，就是拿破崙戰略的航空化與機械化，愛因斯坦的時空不分的「連續域」的理論的寫照（德國人當然不承認）。但是閃擊戰的最有價值的貢獻，還不是內燃機關所造成的速率問題，而是因為：（一）它能根本推翻第一次大戰的經驗論者（如馬奇諾、雷鑑、甘末林等）於無地容身的地步，消滅機關鎗的權威；（二）在高度的效率

下，可以減少戰場消耗，比較人道（波蘭、挪威、法、比、南希諸戰傷亡人數的總和，不及凡爾登一役的消耗）。

因此，殲滅戰略在目前達到的最高限度，就是閃擊戰，而尤以一九四〇年夏季的對法、比戰役為典型的圖樣，基於目前科學上根本的轉變和廣博的發現，閃擊戰還有更臻於高級發展的可能，譬如至今尚未使用的毒氣、細菌和現代進步中的電氣化學與原子放射作用（死光）等若移到軍事科學的實驗領域裏來，新型的殲滅戰就會成立，祇看各國的思想家努力的程度而定。

第二節 重力與速率

一個機械的論據——重力的關係——速率的關係——重力與速率的配合演進——比較研究的結論

論證至此，我們對於殲滅戰的原理問題，已可達到一種機械的論點，即是不妨借用力學和簡單算學的看法來作一結論，以概括勝負關鍵的所在。

如恩格斯所說，歐洲近百年來物力急激發展的結果，已根本變動了人力、物力的功能。所以若以百年前的兵法來遂行現代的戰略任務，自然不能奏效。西線攻擊戰之所以失敗，主要即是因為時空質量未能與戰略思想配合，當代的科學條件得不到藝術手腕的運用所致。

那麼，科學條件是什麼呢？

一切戰爭的攻擊都是三種因素造成的，其公式是：

兩度空間的衝力 + 三度空間的壓力 + 四度時空的連續

= 攻擊力 - 損害 = 戰果

用普通的話說，則是平面的衝力（如各兵種衝擊的力量），與立體的壓力（如各種兵器打擊的力量），必須使其重量與速率成正比，而對方可能發揚的抗力（主要為水平力）與我方衝鋒兵種的「能損度」，則必須成反比。這樣才能維持攻擊的力量至戰勝為止，不會中途頓挫。

在重力方面（二度空間的衝力與壓力），首看衝力：在拿破崙戰爭時期，組成衝力的兵種，祇有步、騎兵二種，其單元的重量為一名步兵二百磅，一名騎兵一千磅，西線陣地戰時期的一般衝力，亦大致略同。閃擊戰時期則除步、騎的衝力外，另增強戰車兵的衝力約十萬磅，汽車兵的衝力約一萬磅（每輛戰車以五十美噸，每輛汽車以五美噸計）。

次論壓力：在拿破崙時期，平均砲彈一發約重十磅，西線時期平均一彈約重五十磅。閃擊戰時期砲彈的重量亦大致相同，但另外加上俯衝轟炸機所用的炸彈一枚平均約四百磅。

以上說明近百年來重力的增加是以飛快的進度發展，拿破崙時期全軍的重量，不過等於現代數百輛坦克車，現代一枚飛機炸彈的壓力，則有拿破崙時期一顆炮彈所能發生的壓力約四十倍以上！

在速力方面（即時間與空間的連續），拿破崙時期每一枝步槍的有效射程爲二百公尺，在一分鐘內的平均射速約爲三發。步兵在會戰中可能突進的速度，每日約爲一百公里。再以每日平均突進八小時，每小時突進十二公里半的速率計，則每一步兵在一分鐘內約可突進二百公尺；騎兵則較此約快三倍，達到六百公尺。這是說明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因衝擊兵種運動力之強與水平火力射程和射速的短小，故在二百公尺的距離以內一舉接敵人，並不是如何困難的事。

在西線時期，每一枝步槍的有效射程已增至一千公尺，每一分鐘的射速亦增至十發。而機關槍的射速則爲六百發，較拿破崙時期平均的射速增加至二百倍。因此迫使衝擊兵種不能不取緩徐速率的躍進（即約一日突進三十公里，每小時四公里，易，每分鐘約六十公尺的速率）。大約十六分鐘的時間，纔能衝過一千公尺的距離而接近敵人。在此期間，平均每每一衝鋒兵種可能被敵火射中的公算，約有一萬次。

在閃擊戰時期，一般防禦火力的射程與射速雖與西線時期無甚差異，但因其衝鋒兵種突進的性能已由平均一日三十至一百公里的筋肉運動進展爲一日三百公里的機械化運動（即在一分半鐘之內即可以衝過一千公尺的距離），故雖有在突進過程中受敵火射中九百次的公算，仍有達到目的的可能（以上均假定雙方的兵力爲等勢）。

這種單元的比較，是證明現代防禦火力的增大，已較拿破崙時期步槍的威力加強三倍至二百倍（機關槍），射程放大至五倍以上。所以西線的衝擊兵種在突進過程中可能中彈的機會實

較拿破崙時期增加三千三百倍，任何筋肉做成的人馬衝鋒兵種都不能抵抗此種彈雨的打擊。因此纔刺激起砲彈質量無比的加大，與衝擊兵種本身的衝力及速力的逐次減弱，退為次要的兵種。至閃擊戰時期，纔急激恢復衝力與隨此而來的速力。

基上所述，在一典型的拿破崙的攻擊戰中，如使用步兵九師，軍騎兵三師，一個騎兵集團，一個砲兵集團（步兵九萬，騎兵二萬六千，砲四百門），共約十二萬人的兵力（按當時編制並等於波羅底諾會戰的兵力），則應有：

步兵衝力：九千噸（美噸）

騎兵衝力：一萬三千噸

砲兵壓力：六百噸（以每門砲射彈三百發計）

以上合計為重力二萬二千七百噸，倍之則為二十四萬人，五萬二千匹馬，八百門砲，重力四萬五千四百噸，其步兵十八萬人每分鐘可能射出子彈五十四萬發的抗力（十二萬人為三十六萬發）。

在西線的攻擊戰中，平均使用攻擊師十個師（每師步兵一萬二千人），不用騎兵，一個砲兵大集團約有砲一千五百門（師砲兵在內），兵員總數約二十萬人（等於德軍開始攻擊凡爾登時的兵力），則應有：

步兵衝力：一萬二千噸

砲兵壓力四萬八千噸（以每門砲平均射彈一千三百發計）

以上合計爲重力六萬噸，較拿破崙時期較多的兵力約增強四分之一，其中砲兵施用壓力的時間，約須一週，故每日平均的壓力約較拿破崙時期增強十一倍。其步兵十二萬人每分鐘可能射出步槍彈一百二十萬發，機槍彈（以每師附機關槍二百挺計）一百二十萬發，合計爲二百四十萬發的抗力，較拿破崙時期同數（十二萬）的步槍火力約增強七倍。

在閃擊戰的攻擊戰中，平均使用步兵十個師，鋼甲師二個師，汽車二千輛，砲一千門，飛機一千架，兵員總數亦約二十萬人，則應有：

步兵衝力（筋肉衝力）一萬二千噸

戰車兵衝力（鋼甲衝力）五萬噸（每輛以五十噸計）

汽車兵衝力（機械化衝力）一萬噸（每輛以五噸計）

砲兵壓力（正面壓力）二萬五千噸（以每門砲射彈一千發計）

航空兵壓力（垂直壓力）二萬噸（每機投彈一百枚計）

以上合計爲重力十一萬七千噸，較拿破崙時期約增強一倍半以上。其中筋肉的衝力僅占總衝力的百分之十六點四，即在七萬二千噸的衝力中，約有六萬噸是鋼甲部隊。因此能損度大為減少，而重量則較西線時期的衝力增強五倍，較拿破崙時期亦增強三倍半。在壓力方面，則以其總量（四萬五千噸）中的百分之四十（二萬噸）由飛機疾速輸送投下，在一日內便可以投擲完畢。

故其一日平均的壓力亦較西線一日的平均壓力（約六千噸）增強三倍或四倍（加砲兵壓力）完全是集中的打擊。

由以上各種機械的計算，可得如下的結論：

（一）在拿破崙時期，三萬二千噸運動相當快速的筋肉衝力，在二百公尺的距離外，可由六百噸砲彈壓力的掩護，在一分鐘內，冒過五十四萬發步槍彈的防禦火力，接近敵人而突貫之（每一衝鋒的步兵有中彈三次，每一騎兵有中彈一次的公算）。

（二）在西線時期，筋肉衝擊的重力已減至一萬二千噸而對方的防禦火力則增強七倍，射程放大五倍，因此突進的速度亦減低三倍。此一萬二千噸的筋肉衝力，在一千公尺之外，等候其砲兵壓力（約四萬八千噸的鐵量）經過一星期的制壓之後，纔冒過二百四十萬發機步槍彈的防禦火力，在十六分半鐘之後，接近敵人的第一線，從事格鬥而結束其第一個段落的攻擊（每一衝鋒的步兵有被命中步槍彈一六六次，機槍彈九九〇〇次的公算）。

（三）在閃擊戰時期，七萬二千噸鋼甲與筋肉混合的衝擊兵種，在一千公尺距離之外，可由其航空兵與砲兵集中大部的打擊壓力（一日內約二萬至三萬噸），開拓進路，在一分半鐘之內，冒過二百四十萬機步槍的防禦火力，滲透對方的戰線而突貫之（每一衝鋒兵有被命中步槍彈十五次，機槍彈九百次的公算，但因約有一半以上的衝擊兵的筋肉自體都蔭蔽在裝甲後面，故能損度又見減低）。

這是說明閃擊戰成功的物理學上的原因所在。

第三節 消耗戰論

消耗戰為應用戰略——消耗戰發生的場合——西班牙的消耗戰——蘇聯的消耗戰——消耗戰必須轉變為殲滅戰——維爾幾尼亞戰役——凡爾登消耗戰——德蘇戰役的批判——現代戰略問題的結論

其次對於消耗戰試作簡單的介紹：

消耗戰是迫不得已的戰法，提到「消耗」二字，即會聯想到「相互抵消」的涵義，與殲滅對方的精神自不相同，誰都不願意。但是基於下列三種社會的情況，消耗戰亦必然時常出現在一部世界戰史裏面，與殲滅戰並駕齊驅，平分天下。換句話說，有殲滅戰便會有消耗戰，有消耗戰就有殲滅戰。兩種戰略形態，是對立的，卻又是調和的；是柔性的，卻又是剛性的；是計畫的，卻更是能變的；以殲滅戰的指導要領開始作戰的，到頭許會膠陷在消耗戰的血泊裏；以消耗戰的壯烈決心奮起抗戰的，最後到許會收穫光輝的殲滅戰的戰果。這是一個刻板冷靜的科學的布局問題，更是一種機敏熱烈的藝術的創造問題。歷史嚴酷的鐵面所顯露給後人的，是失敗的例子，更多於成功的例子！這三種消耗戰的背景是：

(1) 交戰國雙方的時代條件相同，都是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勢均力敵，無法取勝，不自然而被

動地陷於消耗戰。

(2) 交戰國的時代條件不相同，一方面是先進國，一方面是落後國，強國方面因作戰指導錯誤，不能取勝，在戰略上故意誘導弱國方面參加消耗戰，以折損其戰力。

(3) 在同上的條件下，弱國方面為應付強國方面的殲滅戰起見，自動地執行有計畫的消耗戰，以減殺其優勢，再恢復為殲滅戰。

第一種背景所造成的消耗戰，像前論的西線消耗大戰，便是一例。德蘇戰場上的消耗大戰（特別是斯大林格拉之戰）又是一例。第二種的例子，有一八六四到一八六年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束場面」。第三種則有成功的西班牙、蘇聯、土爾其、中國和失敗的菲律賓（一八九九）、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一九四六——一九三八）。

現代的消耗戰是開始在西班牙，那時正是拿破崙在歐洲頂天立地，卻「望洋興歎」的時候。一八〇八年的夏季，可說是法國人最得意，歐洲人最倒霉的一個階段。拿破崙在大陸上已沒有對手，在海洋上也祇有一個英國，他的大陸政策把歐洲封鎖在閉關的境遇裏，他的軍隊和警察鎮壓着全歐，他的最北的步哨站在波羅的海的燈塔上；他的最東面的步哨站在波蘭和俄國交界的地帶；他的最南面的步哨站在羅馬的廢墟上；他的最西面的步哨便站在西班牙的王宮裏；而西班牙王斐地南七世都被「綁票」到巴黎去，換上了一個名叫約瑟波拿巴特的坐在馬德里的宮殿裏；就是拿破崙本人的大哥！法國軍隊在西班牙趾高氣揚，處處以先進的大國民自居；儘量把魯騷和

大革命時期的理想傳授給有志向的西班牙青年。西班牙被訓練好之後，便第一個起來反抗「侵略的法國人」，把自由的烽火傳遍整個的歐洲，在以後六年的解放戰爭中，法軍六七個元帥率領數十萬人，橫行西班牙全境，對於敢以真面目出現的西班牙革命軍，一再加以懲罰的打擊，如入無人之境。西班牙的革命戰略起先尚擬施行殲滅戰，但在一八〇八年到一八〇九年之間，經過一次大勝（一八〇八年貝冷之戰），和六次大敗之後，便放棄了殲滅戰，而改用有計畫的消耗戰。全境每日的游擊戰鬪，平均總要消耗法軍二百人，一年約七萬人，三年便是二十多萬人；國內主要的據點，無不「真正」死守到最後一人，連石頭瓦片都變成巷戰的武器，壯烈抵抗的戰蹟，真是可歌可泣。單以沙拉古撒一城的防禦而論，便是世界戰史中最「拚命」的榜樣。從一八〇八年夏季起到翌年春終止，法軍以十萬之衆兩度來撲，西班牙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扼險拒守，法軍兩度失敗，三易主帥，最後是由拿破崙最勇敢的驍將蘭納擔任指揮。西班牙則由二十八歲的大學生巴拉福斯率領全體市民防守。打到最後，每一間房子都變成一個堡壘，每一個「堡壘」的樓頂上都有壯烈的格鬪。當時有一叫做奧古斯地娜的西班牙女子參加戰鬪，手燃火砲，轟斃法軍甚衆，使蘭納哭笑不得，至今傳為美談。擺倫曾謳歌讚美之。沙拉古撒防禦的結果，男女老幼八萬人口中，戰死和被屠的共達五萬九千人，而法軍精兵死者亦達三萬人，實在是值得來的消耗戰。西班牙人有這一股悲涼鬱勃的愛國情緒做原動力，故非拿破崙的威權所能屈服，打擊所能搖憾，更非生活的困苦和敵人的利誘所能軟化。在近代史中，再找不到像沙拉古撒這樣悲壯的榜樣。

在西班牙單獨抗戰的三年中，所有險要的山地都變成了游擊根據地。革命政府亦搬到全國最南端的一個海港上，努力維持着海上唯一的國際路線。法軍的情況，則和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一樣，在野戰上常常得勝，卻始終收穫不到真實的效果。將近二年之後，纔由英國派遣一支小而有力的野戰軍來支援抗戰。這一支英軍在威靈吞指揮之下，在以後五年中（一八〇九——一八一四）和拿破崙軍隊作戰的情形，站在國人的觀點上看，最好是拿湘軍和太平軍的交戰情況來比較：一方面是十蕩十決，嗜戰若狂；一方面則穩扎穩打，非勝不戰；一方面是重兵合擊，輕師遠襲，一方面則深溝高壘，以逸待勞。換句話說，威靈吞便是曾國藩，拿破崙的元帥們便是太平軍的諸王，而西班牙的軍隊便是「會打游擊」的綠營。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年間，威靈吞被迫困守葡萄牙首都外圍陣地時期的苦況，實不亞曾國藩之困守祁門；在一八一二年的出擊並攻占巴達約斯和羅立古塞，則如湘軍之克九江、安慶。到一八一三年的夏季，威靈吞歷經戰鬪的磨練，已能對法軍採取攻勢，遂乘拿氏遠征俄國的機會，與西葡各軍合流，向馬德里進攻，卒在沙拉曼加一戰，摧破法軍的主力，克復馬德里（蘇州）。一八一三年再敗法軍於維托利亞（常州），消滅約瑟波拿巴特最後反攻的希望，再敗法軍於比里斯山（一八一三年末），將其逐出國境，乘勝追至法國南部，與普奧俄聯軍合圍巴黎（天京），迫拿破崙退位。這一種東西戰史的比較研究，雖然不盡確切，但是站在戰略的觀點上作輪廓的比擬，亦不無足資理解之處，故作如是的借證。總之，當時這一支六萬人弱的英、葡野戰軍，便是西班牙民族解放戰線的基本武力。如果沒有這一支堅強不屈貫徹始終能夠

「積小勝爲大勝」的主力，沒有威靈吞的防禦戰鬪的本領，法軍是不會被西班牙的石塊瓦片和游擊隊的「亂咬」驅逐出境的。歷史指示後人注意的，就是要在千頭萬緒中摘出最有決定關係的因素來，而歷史哲學需要後人思考的，則是當年精神泉源之所自來。西班牙消耗戰所貢獻的社會意義和時代影響，就是十九世紀初期除法人以外的普遍民族意識的覺醒。因此影響到歐洲大陸，促成普魯士的解放，俄國的抗戰與西方民族主義怒潮的匯流！

西班牙所推行的消耗戰的軍事影響，維持了一個世紀，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希臘解放戰中，在南美洲巴西、波里維亞、阿根廷諸國的獨立戰中，在北非洲阿刺伯人的反抗戰中，在二十世紀的民族解放戰中，都被參證借鏡，最新的大榜樣，則是蘇聯大革命時期的消耗戰（一九一八—一九二一）。

蘇聯消耗戰正確的歷史名稱，俄國人自稱爲「國內戰爭」，或「反武裝干涉戰爭」，在蘇聯社會發展的階段上，則是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革命工作，是俄國共產黨領導其民衆從事於存亡繼續的救亡的戰鬪，這一偉大的革命戰爭中所包容的因素，較西班牙複雜多了。但是我們站在軍事本位的見地上，祇可作一戰略範圍的論證。

俄國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裏成功，莫斯科和列寧格拉（那時還叫彼德羅格拉）歸入布黨的手中。共產黨是注意城市的，所以這給了他們以很大的軍事條件鐵路、工廠、電信等技術工具的集中，保障以後紅軍的內線作戰的指導，成爲可能。在政治的一面，則以軍事共產主義的推行，把

全國的物資（主要是食糧）「放在一個大口袋裏重新分配」，更使紅軍不怕封鎖，前線部隊和後方工廠不愁給養的竭蹶。但敵人卻是龐大的，包括德、奧、土、保、英、法、美、日、塞、波、羅、捷、芬、拉、立、愛等十六個帝國主義者及其附庸的軍隊，此外尚有數百萬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白軍」，由經驗宏富的帝俄軍官指揮，三年之中，自四面八方進攻莫斯科達十次之多。蘇聯政府則除其政治理想外，一無所有，僅能組織工人農民用游擊手段應付，因此或以士兵擢升師長，胡亂指揮；或由新聞記者率領大軍「學習」打仗，種種笑話，悲哀慘事，不一而足。在飛機大砲之下，哥薩克騎兵鐵蹄之前，烏合之衆，軍紀蕩然，逃亡的風氣嚴重到不可想像（在紅軍召集總數五百五十萬人中，最低限度犯過一次逃亡的竟達四百三十萬人！），但由於列寧領導的堅強，托洛茨基指揮的辛勤（我們不該抹煞托氏），紅軍中參謀制度的復活，共黨政工人員的獻身的努力（陣亡五萬人），前線終得以維持下去。莫斯科、列寧格拉兩度危急，均賴決死的奮鬥而解圍，六十萬紅軍的正式部隊在一羣青年指揮之下，利用莫斯科輻射的鐵道網施行內線作戰，在一九一八秋季和一九一九年春季，把白軍自東南湧來的幾個大波逐退。在歐亞廣漠的大地之上，數百萬的游擊隊東西飄忽，南北機動，前後不分，零整互化，弄得英、法將領，白軍宿將都莫名其妙，摸不着頭腦。挨到一九一七年的夏季，紅軍已從戰鬪中也漸鍛鍊出來，打仗亦能有板有眼，士兵不會中途開會，加以敵方陣容散亂，互相猜忌，十九個政府和十六個國家都不能合作。白軍的將領們則都想先進莫斯科，目空一切，大步邁進，因此給了紅軍反攻的機會。一九一九年五月，夫倫世指揮紅軍十一萬人（夏伯陽爲第二十五師師

長），在烏拉山下試作殲滅戰的攻勢，居然成功。白軍哥爾察克的主力十二萬人，被側擊狂退，逃過烏拉山。夫倫世跟蹤追擊，沿途受列寧訓誨，多依克勞塞維此的原則，作戰更有進步。九月，土布爾河一戰，白軍反攻失敗，被殲二萬人，以後紅軍在四個月內的長進，是經過沿途僵斃在西伯利亞雪地中約七十萬具的白俄逃難者的屍骸，達到外蒙邊境的。這或可想見蘇聯紅軍第一個殲滅戰的尺度。

烏拉山殲滅戰奏功之後，托羅茨基（卡美涅夫）參謀本部的作戰指導，即由消耗戰轉變爲殲滅戰，以革命的英雄氣概，主動地尋找白軍決戰。結果證明此種勇敢理想，確有成功可能。一九一九年十月，葉哥洛夫和布登尼的步騎包圍白軍鄧尼金部的主力，逼之南退。一九二〇年三月，布登尼雄壯的紅軍騎兵第一軍長驅而入古班，領馬黑海海岸，共俘虜十二萬人，砲三百三十門，和英國戰車多輛，這是第二個殲滅戰。

第三個殲滅戰是失敗的教訓。莫斯科打了兩次勝仗以後，便異想天開，以爲世界高潮已至，一方面派杜嘉契夫斯基和布登尼統率六軍人和一個騎兵集團跨進波蘭，一面便搖起「世界革命」的紅旗來。這使西歐各國有點慌亂，立刻加強波蘭的戰線。結果杜嘉契夫斯基兵臨華沙城下，功虧一簣，被魏剛（福煦的參謀長）殲滅，折兵十五萬人，退回蘇聯國境，從此不能再出國門一步。但是法國參謀本部想跟蹤利用白將胡蘭格爾在南俄建立根據地的企圖，亦被夫倫世、布登尼、加倫三將當頭一棒，將其消滅（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克里米亞的殲滅戰），驅逐最後的一批白俄。

(共十四萬五千人)駛離黑海，永離其「祖國」。所以蘇聯革命戰爭的歸結是證明蘇聯的革命勢力能夠堅決地保障不被武力顛覆；但是紅軍的作戰能力亦祇限於國內的勝利。

所以，從上列這兩個戰例觀察，消耗戰略之被較弱的一方面採取為基本戰略，亦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到後來一定要恢復為殲滅戰，積極的打擊敵人，從而收穫其消耗過程中所結之果，纔能達到戰略的目的。倘若單靠游擊戰為博取勝利的手段，便是軍事上不符實際的幻想，在國策上也是一種慢性的自殺，在歷史價值上更是悲慘的浪費。

西班牙、蘇聯和中國的抗戰，都是消耗戰略合理的榜樣，是較弱者抵抗其強敵時的不二法門。相反的失敗的例子，則有菲律賓之抗美（一八九九——一九〇〇）、波爾民族之抗英（一九〇〇——一九〇二）、里夫民族之抗法（一九二一——一九二三）、阿比西尼亞之抗意（一九三五）、西班牙的內戰（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等，其結果亦多為世人所知。這是消耗戰略史的主流。

第二種消耗戰，即強國故意誘導弱國方面參加消耗戰，以折損的戰力的例子，可以美國南北戰爭中的維爾幾尼亞戰役（一八六四——一八六五）為典型。這次戰役對於以後西線的消耗大戰很有影響。

在維爾幾尼亞戰役發生以前，代表工業社會的北軍和代表農業社會的南軍已交戰三年之久；在北部方面，雖有雄厚的財力與新興的工業基礎，並且人口亦超過南部三倍（二千萬對六百

萬），但是南部因為具有優良的職業軍人和善戰的民衆，並有與國的同情（主要是英國）。所以北軍在美國東部的主戰場上，簡直無法取勝，祇在西部的支戰場上，發得不斷的進展。終於在一八六三年的冬季將南軍的作戰根據地亦為政治中心點的維爾幾尼亞省，施行了大包圍，把南軍的總司令李將軍所部的精兵驍將，牽制在維爾幾尼亞省西北部一塊名叫「荒野」的森林地區裏。這時北軍總司令格蘭特（後為美國總統）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運用正規的殲滅戰略實施外線作戰，讓南軍自由機動，然後在最後的會戰裏和他決勝；另一條則是攻其所必救，把全部兵力集中一起，向南軍正面徐徐壓進，直超南部的首都里士滿，誘導李將軍前來攻擊，以折損他的兵力。這兩個攻勢的第一案預期犧牲較少，但成功的公算亦較小（李將軍已在三年中大敗過北軍十餘次）；第二案則預期犧牲必大，但敵軍亦必犧牲較大，而且不會有何意外。格蘭特考慮之後，決採第二案。這時南軍野戰軍的總兵力，約有十萬人，其中集結在「荒野」第一線的有六萬五千人；雙方兵員已經枯竭，不能再事補充。北軍則有第一線的兵力十二萬人，以後補充增援，要多少有多少，毫無問題。所以格蘭特看破這一點，決心不惜犧牲大量流血，把南軍有限的血吸盡，使之一蹶不振。當時北部要人對於此種硬幹的作風，多不同意，就是林肯也很懷疑。但格蘭特報告他說：「我決心在這條線上打一整個夏天！」他又名他的戰略為「錘擊戰略」，意思就是不顧一切，祇一錘一錘地打下去，直到對方軟倒為止。這種戰略，無疑的便是日後西線協約國的「掃擊」戰略的來源，但因情況不同，故結果亦不同。

格蘭特的大軍在一八六四年五月間開始移動，全軍密集，如山而進。李將軍立刻指揮南軍精銳向其猛撲，在「荒野」的亂林裏混戰一週，殺傷北軍一萬七千餘人，南軍亦折損一萬人。北軍雖傷亡慘重，但在格蘭特的嚴令之下，仍勉強推進到斯潘齊爾伐尼亞站，由此便可直趨里士滿。李軍又率主力向其突擊，再度殺傷北軍一萬八千人，南軍亦死傷一萬一千人。格蘭特心如鐵石，仍推進不已，不久又戰於北安娜河，北軍死三千餘人，南軍死一千餘人。至六月初，李將軍退到里士滿附近地區，選定冷港高地線，隱伏以待北軍。格蘭特果向之攻擊，結果南軍的火力一齊發揚出來，據說在十分鐘內，便擊斃北軍六千餘人，南軍幾無損失。這是北軍自來未有的慘敗。但格蘭特毫不在乎，仍猛攻不已，狀如瘋狂（這時北方社會裏已在喚他做「屠夫」了）。從冷港到彼德斯堡一線，一月之內，雙方又傷亡三萬餘人（北軍一萬八千，南軍一萬二千）。到八月初，格蘭特自開始推進以來，兩月內已損失七萬餘人，但後方兵源補充不絕，給養、彈藥均極充實，經常保有野戰軍十萬以上。李將軍則除傷亡四萬人外，剩餘兵力已不滿六萬，多半疲憊不堪，死一人便少一人；在戰術上雖常常得勝，在戰略上卻完全被動。到八月後，南軍浴血裹創而戰，已無力阻止北軍浪潮的湧進。格蘭特遂將南部的首都里士滿和彼德斯堡地包圍，繼續向南軍陣地進攻，晝夜不息，不讓南軍有休息的機會。到一八六四年底，李將軍的愛里支軍被殲於杉溝之戰，勢力更孤。一八六五年三月，格蘭特遂加緊進攻，用騎兵封鎖里士滿、彼德斯堡的糧道，李將軍給養斷絕，率領部下不滿四萬突圍出走，圖與數百哩外的另一支南軍會合，當被格蘭特打散一萬多人。到四月上旬，李將軍退到阿波馬托克司，

孤城落日，四面楚歌，被北軍十餘萬層層包圍，無法突出，遂以殘部二萬八千二百餘人，降於格蘭特。南北之戰告終。格蘭特攻擊一年，先後折損十萬人，但結果則將南軍主力（亦近十萬人）消滅，攻陷南部的首都里士滿，捕獲南部的總統召維斯，結束戰爭，完全出人意外。世人徒重表面，都沒有看出來。所以維爾幾尼亞戰役所代表的剛性的消耗戰理論，實在是一種數學上的勝利，並為美國青年資本主義龐大的邁進精神的徵象。李將軍和格蘭特二人，恰巧代表兩個時代：李將軍是拿破崙時代的人物，其將風是唯心的、英雄的、藝術的，成功的可能性是「或然」的。格蘭特則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代表，是唯物的、冷靜的、科學的、成功的公算是「必然」的。

第三種消耗戰，即程度相等的強國互相消耗的戰略，可以找到兩個榜樣：第一個是我們已經說了多次的西線消耗戰，第二個是德蘇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間的消耗戰。

西線的消耗戰可認為是維爾幾尼亞戰役的間接影響的擴大重演。試觀格蘭特一向被英國戰史視為不明兵法的「屠夫」，到西線大戰時忽然轉變論調，譽為具有眼光的先知，便很可玩味（見福勒著「李將軍傳」）。但事實上西線的歷史卻是失敗的重演，不是成功的發展（主要是因為歐洲時期的「李將軍」已有機關槍）。

差強人意的戰術上的收穫，或可以凡爾登會戰作一典型。在凡爾登會戰中，法根海將軍採用緊密的步砲協同戰法，在六個月間，有計畫的消耗了法軍四十六萬人，德軍祇消耗不到三十萬人，這是西線四年中攻者的損失少於守者的唯一例子。

最後，在德蘇戰爭中，閃擊戰又過渡為消耗戰。納粹德軍基於下列三種原因，故攻勢難期順利進展，消耗甚大，變成一種特殊的「運動戰中的消耗戰」。這三種原因，就是（1）德軍在開戰時集中的兵力還不夠強大（一百七十個師）。此種兵力，以之「蠶食」數城則有餘，以之「鯨吞」歐俄則不足，故祇能有戰術上的成功，不能有戰略上的收穫，失去奇襲的機會。（2）是蘇聯戰術運用的活潑，像水流一樣，隨時把德軍淹沒在各個作戰面的漩渦裏面，因此減殺其突進的速度。（3）是雙方物力的相等，與補充率的相等，戰場又變成鎔爐，祇有蘇聯的地理條件沒有使兩軍陷入陣地戰的僵局（斯大林格勒之戰是要塞戰）。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對於現代戰略方法所得印象，雖然尚屬粗糙，當可達到一種大致的結論，那就是：現代戰略正和有史以來的戰略一樣，都是循着正反兩面而發展，在正面是殲滅戰，在反面則是消耗戰（日人稱為速戰速決與持久戰）。其原理亦不外時空質量的連續，陰陽剛柔的變化，能得天之道者則^勝，反之則敗。天道有二：（一）是戰爭的目的是否光明正大，具有不背因果法則（心理的）的善徧的永效；（二）是戰略的運用能否掌握當代要素的神髓，先發制人而不為人所制！

結論

在本書裏，筆者用隨筆的方式來討論世界戰爭的煩複現象，並以思想主流的演進，作為申引的重點，論證至此，大體上已達到某一步的段落，要再從事具體的論述，則非致力於專門的研究不可。此種工作，在筆者目前所處的環境下，尚難勝任，惟有俟諸異日和海內高明的糾正。在目前，筆者祇能就其限度所得，綜括上列各節所已達到的論點，及其未經明顯提出的涵義，再為一種總和的歸納，並作為本書的結論：

(一) 戰爭現象是一種思想力的結果，這已有多方面的因素足以證明。例如：(1)科學的形上學對於新的宇宙真理的估量與舊有定律的打破；(2)歷史因果循環律的再被證明；(3)戰爭勝負關鍵之所繫；(4)現代社會思想問題的關係等。

(二) 戰爭應有執行真理的義務，促使人類的創化的努力能有加速的宏布，不然即是逆流的趨向，遲早必歸淘汰。真理的現實的意義，應是：(1)人類應以互助為極則，生存競爭之說，過去即非目的，祇是手段，若併此手段而消滅之，亦非沒有辦法，即達爾文亦承認之。(2)因此將來的社會必定是建立在一種新的哲學智慧的基礎上，那時社會條件亦必隨之而演進，人類自然不願再供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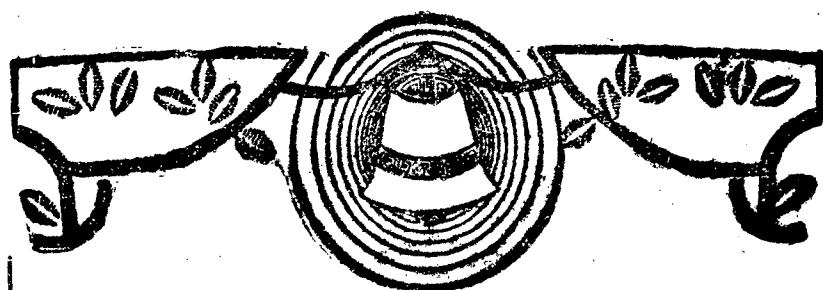
謂的犧牲，而移其欲望在科學發明、社會建設方面。所以戰爭的道德價值，必須爲此種思想的護法，爲達到此種政治理想而奮鬥。

(三)人類思想應求主動的醒覺，尤以戰爭時期爲最。軍事鬪爭之機關關鍵的所在，不過是一「時空連續域」與各種心理的與物理的感應及其複合運動的問題。經驗所示，戰略思想絕對應對人類負責，不可讓戰爭的本身倒轉來支配思想，以免變成因襲或被動，繼續製造多餘的浪費。

(四)未來的戰爭必以更猛烈的形態出現，各種因素或將趨向心理學與電學方面的發展。消耗戰決不是戰爭正常的現象，而僅是思想偶然陷於停滯被動時的病態，或一時的應用的手段。未來的軍事家、政治家、科學家們務須着眼於較閃擊戰更進步的戰略，並爲減少無謂的屠殺與浪費而努力。此新型如殲滅戰在軍事哲學的意義上，應是一種「人道的戰略」！

(五)中國的政治哲學與西洋的新創化論的結合，很有達到上列理想的可能。故我們認爲真理不但目前站在我們這一面，就是將來的偉大的遠景也是一樣。這樣纔能夠把戰爭當作一種王道的、創化的過程，避免循環的浪費，而臻人類爲真正具有理性的「超人」。

歸結是在太平洋的東西兩岸，孫中山和威爾遜的精神應指導下一代的人類。正如羅素所說：「方纔結束的時代裏的重要的人物，是愛迪生、洛克漸、列寧和孫逸仙，其中除孫逸仙外，這些人都缺乏修養，藐視過去！」



版權所有
究必印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渝初版

西洋戰爭思相評述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發者黃秉遐
著行人吳正中
刷印所正中書局
發行所正中書局
正中書局

校整
斌海

(1886)

中國人文科學社叢刊

物價統制論

伍啓元編著 一元一角

中國法律之批判

蔡樞衡編著

八角

日本的歷史

王迅中編著

一元六角

民治獨裁與戰爭

王贊愚編著

六角

從心理觀點談人事問題

陳雪屏編著 七角五分

貨幣新論

滕茂桐編著

一元一角

國民所得概論

巫寶三編著

一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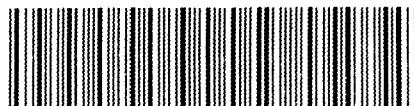
◎書用華大科各版出◎

◎張紙具文種各造自◎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總局支全局 國各 大市 號二四二路一山中慶重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646B

重庆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忠國字第346號審查證



上海舊書店

冊數

售價 20

上海舊書店

冊數

1614302

上海图书馆藏书